

從皇家靈囿到萬生園—— 大清帝國的動物收藏與展示

余慧君*

光緒三十四年(1908)，「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正式對外開放，或稱「萬生園」，是大清國第一座包含動物園、博物館、博覽園等複合功能的中央級農事試驗場。本文分析從十七世紀末盛清以來、綿延超過兩個世紀之久的大清皇家園囿動物展演儀式，如何被執政者逐漸「去脈絡化」，同時又「再脈絡化」進這座全新的農事試驗場裡。大清立國以來，許多熊虎等猛獸，擔任皇家春蒐秋獮儀式要角，在儀式過程中被降伏、犧牲、或將其毛皮棺置展示於祭壇前。十九世紀中期後，皇室放棄南苑春蒐儀式，園囿內圈養的動物們失去儀式舞臺。同時，伴隨全球動物貿易網絡興起，皇家動物園囿轉型成清國第一座公共動物園，祭壇前的猛獸毛皮棺置轉型成博物館標本展示，提供城市大眾日常休閒娛樂，也為慈禧締造重要的觀看媒介。這座萬生園，嫁接在大清既有的皇家豐產儀式上，重新詮釋「生養萬物」並「滋養萬民」的古典政治修辭，在「儀式化自然」的基底上，逐步融入更多「現代化自然」之政治操作。既有的藉田禮與親蠶禮，轉化成企圖提高生產力的科學實驗；而春蒐儀式裡的猛獸們，得與其他百鳥百獸，共同成為被長期馴養窺看的對象。

關鍵詞：萬生園、農事試驗場、動物園、博物館、慈禧

*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908年6月16日),位於北京城西直門外、原屬於清內務府奉宸苑管轄的樂善園,併周邊一些民地,整修改制為「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以下稱「農事試驗場」),全部竣工正式對外開放。¹整個場區基地占地約71公頃,是第一座由清中央部會主導的農事試驗場,其內包含售票開放「以便公眾游覽」的「博覽園」,以及中國首座「動物園」。²

根據農事試驗場於光緒三十四年四月(1908年5月)擬定完成的〈本場章程〉,全場空間使用分成兩大區:「農事試驗區」與「博覽園」。農事試驗區包含五穀雜糧、蔬菜、果樹等實驗園圃,並「附設農業學堂以期造就農學人才」。³博覽園則包含花卉苗圃及各項休憩園林造景,在建築與景觀設計上與農事試驗區有所區隔,其「所屬各項廳房樓屋亭榭橋樑,或用中式或采泰西日本諸式,藉以助帝京之景物」。⁴同時,「於博覽園內設動物園與博物館,藉以開通智識及供學理之參考」。⁵農事試驗場附設動物園,即現今北京動物園前身,由動物科主掌,其職務為「研究害鳥害獸之有關農事者、收集本國各地特有動物、收集各國特

1 對於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清末不同作者的各類文獻中指稱各異,有稱之為「農事試驗場」、「萬生園」、「萬牲園」者。本文陳述時將整體場區稱為「農事試驗場」,「萬牲園」則單指農事試驗場裡的附屬動物園;若從慈禧太后角度指稱,則用「萬生園」。

2 葉基禎,《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報告第一期》,〈本場章程〉,頁17。

3 葉基禎,《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報告第一期》,〈本場章程〉,頁17。

4 葉基禎,《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報告第一期》,〈奏章恭錄〉,頁6。

5 葉基禎,《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報告第一期》,〈本場章程〉,頁17。

有動物、研究動物之生理型態解剖」。⁶附設博物館，則由博物科負責，業務包括「製造學堂應用動植礦物標本、收集中外各種動植物標本、陳列各省農產物品農業器械、發賣各學堂農產植物標本」。⁷這是大清國中央各行政單位中，官方章程第一次使用「動物園」和「博物館」之組織名稱，前者管理活生生的動物，後者管理動物、植物、礦物等自然史標本。

對京城仕紳而言，農事試驗場之所以異於其他園林之處，在於裡面不僅有皇室行宮，同時設置了大清國的第一座官方動物園，正如員外郎孫寶瑄(1874-1924)於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1908年6月24日)與大理院同僚遊覽園區，在日記中特別提到「兕虎猿鹿之類皆標其名且書其產地與性質，其種萬千」。⁸而對境外使臣而言，大清第一座附設動物園的農事試驗場也極具吸引力。據說，開放之第十天，即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1908年6月25日)，農事試驗場接待一批外國官方來賓——廓爾喀使臣，正是因為場內「生物俱備」而來。理藩部致函農工商部，轉述廓爾喀使者「竊貢使遠在西陲，向慕中華風景，聞農工商部有萬生園一座，內中樓閣宏敞，生物俱備，為世界奇觀」，因而在理藩部官員陪同下，廓爾喀使臣參訪農事試驗場，並獲贈一些植物種苗為禮物。⁹

一直以來，動物對大清國的運作貢獻卓著。例如，馬的絕佳的速度，能使幅員廣大的帝國訊息運輸順暢，並擔負八旗鐵騎的基本武力，確保帝國皇權金甌永固。而許多外來動物，如大象，以瑞獸之姿被朝

6 葉基禎，《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報告第一期》，〈本場章程〉，頁26。

7 葉基禎，《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報告第一期》，〈本場章程〉，頁26。

8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下冊，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頁1205-1206。

9 楊小燕，《北京動物園志》，頁96。

貢到中國，象徵天朝藩屬體系運作正常。¹⁰不管是從實用面到象徵面，動物都是大清國權力運作中的一部分。然而，這些動物到底在什麼儀式脈絡下被展示？大清內務府透過哪些管理機制，生產皇室動物之觀看經驗？隨著大清國力與皇權觀念漸漸改變，從十七世紀末盛清至二十世紀初晚清時期，皇室圈養動物的管理機制與展演儀式如何改變？乾隆時期(1735-1796)的皇家百獸園，相較於農事試驗場內之公共動物園與博物館，有本質上的差異嗎？考慮清末的財政壓力，慈禧主政時期何以需要投資一座附設動物園與博物館的農事試驗場？再者，除了現代性所引發的政治革新，與西方自然科學觀念的影響之外，大清皇室既有的動物蒐集與展演儀式，在多大程度上融入清末農事試驗場的管理與觀看經驗裡？以上諸問題，是本研究的出發點。

農事試驗場的功能與管理機制甚為複雜，本文聚焦於其中的動物展示部分，特別是首開風氣之先的動物園與博物館內的動物標本。

自從哈里特·里特沃(Harriet Ritvo)於1987年出版《動物莊園——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和其他生物》(*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一書，分析動物在近代世界帝國主義形成與殖民統治權力運作過程中所扮演的媒介角色，動物成為歷史研究的主要對象之一，提供考察西方現代性生成與運作的嶄新面向。¹¹布雷特·沃可(Brett L. Walker)在〈動物與歷史的親密關係〉(“Animals and the Intimacy of History”)一文中，將動物視為歷史敘述的能動者，放棄文化自然的二元對立觀點，回顧了環境歷史書寫中，人(作為一種動物)與其他動物之間，超越彼此生物性與歷史性界

¹⁰ 毛憲民，〈清代鑾儀衛馴象所養象〉，頁16-21。

¹¹ Harriet Ritvo, *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 Aaron Skabelund, “Animals and Imperialism: Recent Historiographical Trends,” 801-807.

線的親密關係。¹²近 30 年來，隨著自然史、環境史、感官史、文化研究的興起，對於十八世紀以降各國主要動物收集機制與動物展示觀念改變的綜論式研究，聚焦於分析西方社會與動物之間關係的巨大改變，從殖民時期西方統治權力努力收集並馴化殖民地物種(包括人種)的渴望，到後現代時期，西方中心論與人類中心論逐漸解構，進而出現維護生態多樣性並文化多樣性的思維與實踐。¹³

對於大清帝國如何圈養並再現動物，目前已有的個案研究，集中於討論盛清十八世紀帝國鼎盛時，動物本身及其再現如何作為統治權力行使之媒介。侯皓之從內務府養狗處的管理機制出發，分析十八世紀盛清諸帝飼養獵犬數量的盛衰，反映了國力變化的曲線。除了獵犬之外，大型獵物亦能反映八旗的戰鬥實力，侯皓之又從皇室獵虎殺虎的歷史，探討虎槍營制度的盛衰，以及清中期以後皇室武藝廢弛的具體過程。¹⁴而賴毓芝從自然史與藝術史的對話出發，分析十八世紀宮廷製作的動物圖譜中之《獸譜》與《鳥譜》，說明清宮動物知識生產與早期全球化的密切關係。¹⁵賴認為乾隆透過造辦處生產動物圖像，

¹² Brett L. Walker, "Animals and the Intimacy of History," 45-67.

¹³ 關於綜論動物收集與展示觀念改變的歷史專書，包括 Robert J. Hoage and William A. Deiss, eds., *New Worlds, New Animals: From Menagerie to Zoological Park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ric Baratay and Elisabeth Hardouin-Fugier, *Zoo: A History of Zoological Gardens in the West*; Vernon N. Kisling, ed., *Zoo and Aquarium History: Ancient Animal Collections to Zoological Gardens*.

¹⁴ 侯皓之，〈見盛觀衰——盛清諸帝飼犬活動的演變與意義〉，頁 137-168；侯皓之，〈行獵詰戒——康、乾二帝圍獵殪虎的意義與虎槍營的演變〉，頁 141-174。

¹⁵ 賴毓芝，〈清宮對歐洲自然史圖像的再製——以乾隆朝《獸譜》為例〉，頁 1-75；賴毓芝，〈圖像、知識與帝國——清宮的食火雞圖繪〉，頁 1-77；賴毓芝，〈從印尼到歐洲與清宮——談院藏楊大章額摩鳥圖〉，頁 24-37。

除了「強調一手的材料收集與敘述」，以求客觀真實的認識寰宇，並「以視覺作為掌握世界與建構知識」的重要途徑。¹⁶

從皇家園囿轉變為公共動物園與博物館的過程中，筆者認為至少需要兩大觀念的支持，一為系統化的動物知識生產，包括物種蒐集、研究、馴養、繁殖動物等；二為向大眾公開展示系統化的動物知識內容。上述兩位學者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前項。而本文將針對後者，即展示機制從封閉走向開放的變化，分析從盛清到清末這兩百年間，動物作為統治權力行使之媒介，如何被臣民們親眼觀看？皇室生產哪些動物觀看機制，向臣民們展示統治權力？而這些觀看機制的推陳出新，如何反映帝國政治的現代性？

本文企圖釐清農事試驗場動物園與博物館成立之前，清皇室既有的動物收集展示之原生歷史脈絡，如何識別可容受的外來現代性觀念並與之結合，產生專屬於清帝國政治脈絡的第一座現代動物園。

為了討論清帝國政治的現代性，我們有必要將研究視角稍微轉向鄰近的日本。東亞諸國中，日本近代自然史的研究脈絡，提供學界觀察現代性的全球傳播及在地嫁接之重要典範，也是熱門的學術論戰場域。¹⁷一則是因為「多元現代性學派」(multiple modernities school)，視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社會結構變遷，為獨特的、高度現代化卻又異於西方社會的多元現代性典範之一；¹⁸二則是大正時代(1912-1926)以後，隨著大和民族主義高漲，而神道教成為大和民族的民族宗教，形成「極端

¹⁶ 賴毓芝，〈圖像、知識與帝國〉，頁 45。

¹⁷ 「自然」一詞在日本語義脈絡中，包含了來自老莊道家玄學思想中「人力不能左右之事態」，以及 18 世紀蘭學傳入後，成為 nature 的譯語。當東西方兩個「自然」概念結合之後，形成天然和諧、順天應時、萬物共榮的理想自然觀。見陳瑋芬，〈日本「自然」概念考辨〉，頁 103-135。

¹⁸ Shmuel N. Eisenstadt, *Japanese Civilization: A Comparative View*; Shmuel 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1-29.

國族並極端自然」(ultranational and ultranatural)的自然觀，相信大自然必會與大和民族形成永恆和諧的美好狀態，並作為「日本例外主義」的基調之一，引發歐美學界的熱烈討論與辯駁。¹⁹

近代日本強調與自然保持永恆和諧關係的自然觀，雖異於西方世界強調控制或征服自然的觀點，仍無法挽救近代日本落入生態危機裡。例如，布雷特·沃可從科學、文明、現代性的概念演化歷程，分析十九至二十世紀期間野生狼群在日本絕跡的歷程。²⁰以恩·米勒(Ian J. Miller)與布雷特·沃可等共同編輯的《在自然邊緣的日本——一個全球強權的環境脈絡》(*Japan at Nature's Edge: The Environmental Context of a Global Power*)，呈現許多萬物無法共榮的環境生態史個案，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擴張過程中對全球生態資源，特別是海洋與森林資源，大量掠奪與污染的殘酷現實。²¹另外，以恩·米勒分析自然、文明、動物在二十世紀東亞歷史的全球化脈絡，以日本上野動物園的建置歷史探討日本的「生態現代性」(ecological modernity)，即透過「智識性隔離與社會性轉型」(intellectual separ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將文明日本與自然界動物(並殖民地)徹底的分隔，並重新定義這個新興民族國家與動物(並殖民地)之間的掌控 / 馴服關係。²²

若由多元現代性的觀點出發，筆者認為，日本自然觀中的永恆和諧美好願景，與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而強力掌控殖民地自然資源的政治實踐，之所以可以毫無扞格的矛盾共存，可能正是日本現代性異於

¹⁹ Julia A. Thomas, *Reconfiguring Modernity: Concepts of Nature in Japanese Political Ideology*, 179-208.

²⁰ Brett L. Walker, *The Lost Wolves of Japan*.

²¹ Ian J. Miller, Julia A. Thomas, and Brett L. Walker, eds., *Japan at Nature's Edge: The Environmental Context of a Global Power*.

²² Ian J. Miller, *The Nature of the Beasts: Empire and Exhibition at the Tokyo Imperial Zoo*, 3.

西方現代性的獨特之處。此獨特之處背後的知識生產脈絡，或可由費德里科·馬孔(Federico Marcon)的《近世日本的自然知識及其本質》(*The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Japan*)釐清。馬孔爬梳了日本「本草學」(honzōgaku)的歷史發展與演變，從十六世紀晚期江戶時代至十九世紀中明治初期，由明代中國傳入的本草學自然史知識與應用方式，透過印刷術大量傳播，使自然脫離神聖隱喻，成為可具體命名的、具物理客觀性的、可確切認知或收藏的知識性商品、並可交易的重要經濟資源，促成江戶時期「本草學者」(honzōgakusha)這一新興知識階級的誕生，幫忙執行官方贊助的全國動植物自然資源調查研究計畫，²³並作為日本拓殖海外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殖民手段之一。²⁴事實上，隨著清朝各級農業教育機構聘用許多日本農業專家擔任教習，日本農業與實業發展大量應用本草學知識生產模式，一部分重行回流中國，與清農政官員共同執行農業科技教育與振興計畫，²⁵完成一段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所謂的概念傳播之「循環歷史」(circulatory histories)。²⁶

從皇家動物園演變為公共動物園，是國家現代化過程中一致的趨勢，然而，各皇室如何接受此趨勢以生產動物園，卻有在地的動物展演文化與政治脈絡可循，提供歷史觀察詮釋的參照比較。針對農事試驗場動物園與博物館的建置歷史，除了西方現代性與早期全球化影

²³ Federico Marcon, *The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Japan*.

²⁴ 范燕秋，〈日治初期的臺灣博物學——日本博物學家與臺灣自然史的建構〉，頁 3-39。

²⁵ 根據農工商部統計表，光緒三十四年，在清國內各級農業教育機構擔任教習的日本人，約 45 人。見王笛，〈清末民初我國農業教育的興起和發展〉，頁 77。

²⁶ Prasenjit Duara,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81-85.

響的詮釋面向之外，本文更關注綿延兩世紀之久的大清皇室園囿動物展演儀式，如何因近代國家治理的需要，而被執政者與官僚行政系統逐漸「去脈絡化」同時又「再脈絡化」進全新的農事試驗場裡。亦即，在既有的清國皇權統治框架內，預備立憲的慈禧新政如何以公共動物園並博物館，重新轉譯過去在皇室園囿發生的動物展演儀式。

以下將分兩大部分行文，第一部分分析二十世紀以前，清皇室主導的動物圈養空間場域與展演儀式，包括皇城內外各小型獸欄與大型的南苑圍場，最後論及農事試驗場內的動物園。第二部分，則針對動物標本為分析對象，說明從盛清至晚清，皇室動物標本展示方式之變化，如何走向現代博物館的建置歷程。

二、乾隆時期京城裡的動物們

李氏朝鮮使者朴趾源(1737-1805)，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隨使節團從高麗漢陽出發，到北京城向乾隆皇帝祝壽。在其《熱河日記》中，記載了一路的所見所聞，詳細描述當時天朝帝都風貌。其中，除了極盡奢華的天朝氣象之外，皇帝的御廄、虎圈、象房、狗房、孔雀圃，以及皇家園囿，圈養著各式動物以供觀覽。

根據朴趾源的記載，御廄在北京前星門，畜養了約三百匹已從沙場退役的御馬，都是 6、70 歲以上不堪騎乘的老馬，僅供鑾儀衛鹵簿陳設時使用。其中有高齡 103 歲的御用千里馬，在退休之後極受禮遇，圉人會依其牙齒狀況調製液態食物。²⁷

虎圈在御廄後面，朴趾源參觀時已是空圈，根據其描述，原畜有二虎，當時一虎已死，另一虎移往圓明園。朴趾源解釋飼虎的目的是

²⁷ 朴趾源，《熱河日記》，卷 23，〈御廄〉，頁 752-754。

為了「皇帝幸行，必檻虎前驅，心有不懌，則臨圈親射云」。²⁸不過，大清皇帝親自射虎，並非心裡不快的泄憤之舉，而是春蒐大狩儀式的殺虎表演。這一點會於以下文中解釋。

象房在宣武門內，根據朴趾源的描述，當時畜養了高達八十餘頭大象。朴趾源觀賞象伎表演，象奴與象搭檔演出，象奴先給象檢視參觀者給的演出小費是否夠多，若不夠多，象則拒絕演出，直到小費累積到一定數額，象才欣然同意之，向參觀者「叩頭雙跪，又掀鼻出齶，如管簫聲，又填填作鼓響響」，以謝賞錢。²⁹

鷹狗處位於東華門內長街，職責在於「豢飼御前鷹狗，以備蒐獮之用」。³⁰為數眾多的凶猛獵狗，都是為了春蒐或秋獮大狩儀式時使用。朴趾源參觀狗房時，有獵狗兩百餘隻，亦得見訓練獵狗對獵物追擊能力的餵食秀。³¹

西苑孔雀圃內則養了三隻孔雀，孔雀鳥身變色、開屏、食蛇等特性，讓朴趾源留下深刻印象。³²

除了以上圈養特定種類的畜欄之外，朴趾源提及兩處各式動物雜處場域，一為西苑紫光閣旁「百鳥房」，一為南海子(即「南苑」)。關於百鳥房，高士奇(1644-1703)在《金鰲退食筆記》有較細緻的描寫，即「太液池北紫光閣傍有百鳥房，多畜奇禽異獸如孔雀、金錢雞、五色鸚鵡、

²⁸ 朴趾源，《熱河日記》，卷 23，〈虎園〉，頁 759。

²⁹ 朴趾源，《熱河日記》，卷 23，〈象房〉，頁 764-766。朴趾源提供的數據與清宮鑾儀衛檔案提供的象隻餵養數據差異甚大。根據鑾儀衛檔案，清內府象房蓄象數目，嘉慶朝時最盛，可高達 35 隻。而乾隆四十四年(1779)餵養 17 隻，乾隆四十七年(1782)餵養 22 隻。見毛憲民，〈清代鑾儀衛馴象所養象〉，頁 16-17。

³⁰ 昭槎，《嘯亭續錄》，卷 1，〈鷹狗處〉，收入昭槎，《嘯亭雜錄》，頁 393。

³¹ 朴趾源，《熱河日記》，卷 23，〈狗房〉，頁 771。

³² 朴趾源，《熱河日記》，卷 23，〈孔雀園〉，頁 772。

白鶴、文雉、貂鼠、舍狸、海豹之類，不可枚舉，本朝不此是尚，但給飲啄而已」。³³因此可知，西苑百鳥房，不止圈養鳥類，也包含各式小型獸類。朴趾源描寫南苑，提到因為植株眾多「一望蒼蔚而烏鳶鷺鷥已蔽天」、「沿道所見所養奇禽異獸，非走馬可竟」，大致上指出南苑是當時皇家專屬的野生動物園囿，放養了各式各樣的飛禽走獸，維持皇家靈園的帝制傳統，可惜朴並未深入描述這些奇禽異獸的種類。³⁴

南苑是十八世紀北京城附近最大的天然林場並家畜圈養牧場，由內務府奉宸苑管理。苑內以野生獐、鹿、牛、羊、馬等草食性獸類為主。³⁵皇室為要維持林中草食性獸類的多元物種並穩定數量，對於肉食性動物如狼、狐、鷹雕等，勢必定時予以圍剿，這是朴趾源可以安然參觀南苑並見到眾多奇珍異獸之故。南苑最著名的野生動物群為「四不像」(Père David's deer, *Elaphurus davidianus*)，是一種大角麋鹿，朴趾源或許亦見到過。此類麋鹿在乾隆時期的南苑數量非常之多，卻不為歐洲自然史學界所知。直到同治五年(1866)，在北京蠶池口教堂任職的法國科學院會員、耶穌會教士並自然博物學家譚微道(Armand David, 1826-1900)意外於南苑見到此鹿種，千方百計取得皮骨遺骸，送到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鑑定為鹿科新屬種，因而命名為 Père David's deer。³⁶自此之後，四不像鹿成為當時各國動物

33 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卷上，頁10。

34 朴趾源，《熱河日記》，卷23，〈南海子〉，頁776-777。

35 鮑麗達，〈清代南苑土地的開發與利用略述〉，頁133-134。

36 關於譚微道取得南苑麋鹿標本的過程，見 Armand David, *Natural History of North China, with Notices of That of the South, West, and North-East, and of Mongolia & Thibet*, 11-12. 除了四不像麋鹿之外，譚微道在中國各地進行物種考察，向歐洲自然史學界介紹的新發現特有物種超過百種，其中最具傳奇性的，是於1869年在四川親見活體大貓熊(giant panda, *Ailuropoda melanoleuca*)，並將大貓熊標本寄送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園積極蒐集的對象。光緒二年(1876)，德國使臣特別奏請大清皇帝送德國一對「四不像」鹿，光緒帝(1875-1908在位)命奉宸苑按照辦理，至南苑捕一對麋鹿，進行動物外交。³⁷光緒四年(1878)，日本公使亦請求清政府寄贈日本宮內省一對四不像鹿，飼養於東京上野動物園。³⁸

除了朴趾源提供的動物圈養地點之外，另外，從其他明清文獻記載中可知，紫禁城周邊還有3處「虎城」及1處「百獸房」的紀錄。一為太液西北側弘仁寺附近的虎城，根據吳長元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編撰的《宸垣識略》記載，「虎城在弘仁寺後，其西北隅有豹房百獸房，今廢」，是明代正德年間(1506-1521)所建之虎城與豹房公廨的遺址。³⁹而康熙年間於景山設有「外虎城」，由「長工三名、服役人一名」負責管理。⁴⁰其後又設暢春園虎城、⁴¹圓明園虎城，及圓明園百獸房。⁴²

37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德國使臣巴蘭德，面稱中國有一獸名四不象，為本國及各國所無，請給一對，送至本國等語。查四不象一物，為南苑中所有，隸奉宸苑管理，如蒙俞允，應知照奉宸苑辦理。從之。」見《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卷26，光緒二年二月四日，頁388。

38 高島春雄，〈四不像盛衰史〉，頁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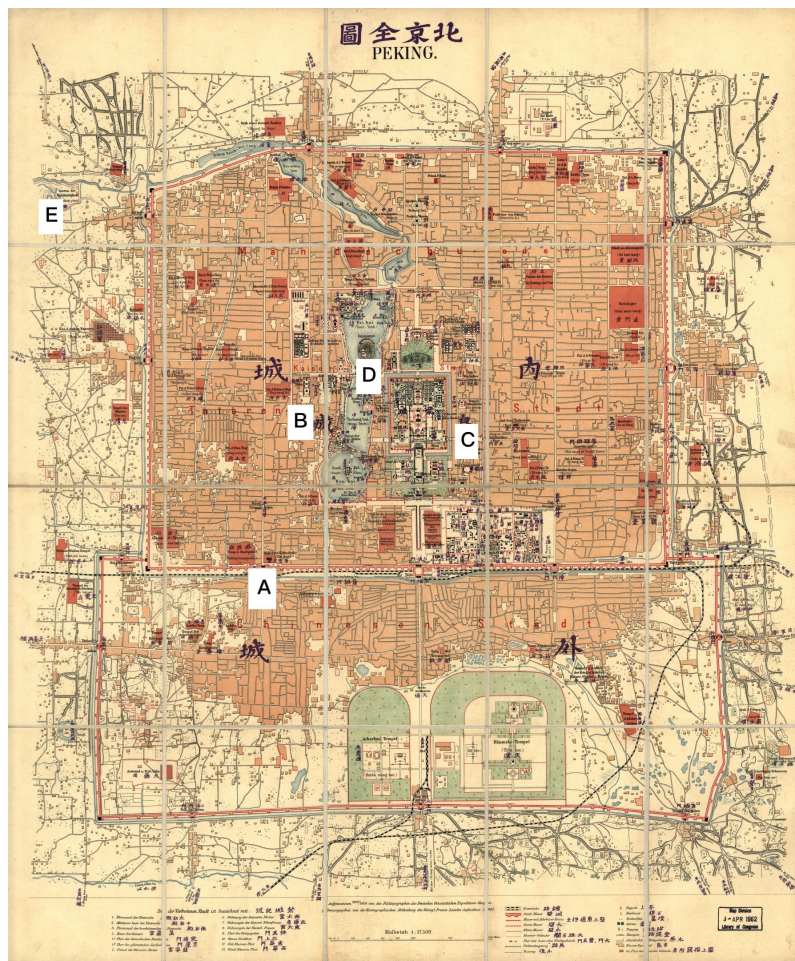
39 吳長元，《宸垣識略》，卷4，頁76。

40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167，頁9。

41 錢泳，《履園叢話》，卷14，〈暢春園虎〉，頁390。

42 根據汪啟淑(1728-1799)在《水曹清暇錄》中寫道：「圓明園西海甸有虎城，築以養虎豹，又有百獸房，畜熊羆麋鹿諸獸，盛以樊籠。虎城上則單鐵條門枋，刊明某年某月某官所進，計重若干觔，每日給豕肉數觔，有人觀則市鷄鶩與食。」見汪啟淑，〈虎城〉，《水曹清暇錄》，卷10，頁159。

圖 1 紫禁城周邊皇室動物圈養地點位置分佈圖



說明：A.宣武門 B.集靈園 C.東華門 D.西苑 E.農事試驗場

資料來源：北京全圖 (Peiking)，皇家製圖部門 (Kartographischen Abtheilung [sic] der Königl) 編輯出版，柏林，1914。收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 (Library of Congress, U.S.A.)

綜合以上文獻紀錄，可大致分析出以紫禁城為中心的皇室動物圈養地點分布邏輯(見圖 1)。北京外城以南之南苑，專門放養野生草食性大型動物。圈養各類大型肉食猛獸的百獸房與虎城，則在北京城外西北方的暢春園與圓明園附近。以上兩處皆已超出圖 1 範圍。而圍繞著紫禁城西側的西苑百鳥房，圈養著禽類與小型獸類，算是可愛動物區。在紫禁城東南側東華門附近，聚集了鷹狗房、虎圈、與御廄，是皇室大狩儀式過程中最重要的動物組合。鷹狗房之獵鷹與獵狗，是虎槍營勇士獵殺猛獸的爪牙；虎圈裡的虎熊猛獸是南苑春蒐大典時被獵殺的對象；而御馬提供大狩行圍儀式的快速移動馬力，同時也可能是曾經在木蘭秋獮過程中，被馴服的對象。⁴³這三類在空間上聚集於東華門的圈養動物，某種程度上象徵了帝國對北方蒙古各盟旗的掌控，或擊殺而亡，或馴服成為帝國武力之鷹犬或馴馬。

北京外城西南側的宣武門附近，是著名的象房位置，象徵「太平有象」。馴象成為皇家禁衛體系成員，常年服務於鑾儀衛，在鹵簿儀隊中身馱銅質大寶瓶隨著皇帝出巡。為了讓大象能勝任鑾儀衛的工作，帝國必須投注人力物力等大量資源，設計一套完整的制度，包括保持貢象來源穩定、馴養、訓練、出勤等等機制。⁴⁴象對帝國的忠臣服務，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帝國穩定掌控馴象所來之處——即雲南、緬甸、安南等西南邊疆。

理解了十八世紀紫禁城周邊，內務府動物圈養的空間分佈狀態之

⁴³ 乾隆時期，每次的木蘭秋獮儀式，蒙古卓索圖和昭烏達二盟會聯合為大清皇帝舉辦宴會，並呈上各式禮品，其中便包括大量尚未被馴服的「生駒」，在宴會過程中，善於馴馬的蒙古王公弟子，在皇帝面前表演教馴馬，以作為宴會娛樂之一。見畢梅雪、侯錦郎，《木蘭圖——與乾隆秋季大獵之研究》，頁 58-59。

⁴⁴ 毛憲民，〈清代鑾儀衛馴象所養象〉，頁 16-21。

後，進一步區分當時皇室圈養動物之目的，大致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目的，是為滿足收藏欲望而圈養各類奇珍異獸，如同清皇室的各類文物藝術收藏般，活生生的動物亦是珍藏的對象，即自明代以來存在的「百鳥房」與「百獸房」概念。其圈養的主要目的，是透過動物收藏以展示帝國具有從域外或境內各地收集多樣性物種的政治實力。而皇室透過圈養、分類、圖像紀錄、詮釋這些動物收藏，以建構對職方之產與坤輿萬國的認識。⁴⁵這些百鳥百獸種類繁多，但每一種類之數量鮮少，也不在任何皇家儀式裡，扮演固定的、不可取代的儀式角色。在獸欄前，人是觀看者，動物是被觀看者，兩者之間角色界線分明。

第二類目的是為儀式性功能而圈養動物，每單一物種數量或可能極為龐大，圈養地點以該類動物特別命名之，包括御廄、象房、虎圈、鷹狗房等。御廄、象房裡的馬和象，皆為皇帝鹵簿行列所使用。虎圈與鷹狗房內的獵食性動物，則是大狩行圍儀式所需。這些動物，與眾多參與人，都是皇家儀式的前臺演出者，彼此幻化成為對方肢體力量與主觀意志的延伸，或相互合作，或彼此搏鬥廝殺。以春蒐儀式為例，這是一場有固定腳本的皇家戲劇演出，南苑晾鷹臺則是劇場空間；虎圈裡長期被囚禁的猛獸則是不得不上場的演員，與訓練有素的虎槍營勇士共同演出事前規劃好的「遇大獸」戲碼。觀者包括現場的大清皇帝、八旗侍衛、皇室成員、特別受邀的內閣高級文官南書房詞臣等，這些支撐起帝國運作的核心人物。此外，當然還包括看不見的天地神靈，共賞虎槍營侍衛表演成功殺虎。⁴⁶以下將詳述之。

⁴⁵ 賴毓芝，〈圖像、知識與帝國〉，頁 28-36。

⁴⁶ 事實上，中國劇場表演形式成型初期，有一齣指標性的漢代宮廷角觝戲《東海黃公》，內容即是黃公手持赤金刀鬥白虎，最後黃公法力不及白虎，為虎所殺。呂錘寬，〈斬命魔與東海黃公——道教儀式中的戲劇化法事與小

三、南苑裡的帝國演武競技儀式

清皇室儀典中，行圍大狩表面上為畋獵，實質上是八旗部隊的軍事演習，在大清五禮中歸為軍禮。行圍依季節區分有兩種，一為年度春蒐儀式，舉辦地點為南苑，每一次南苑行圍，皇帝離開紫禁城大約十天左右；另一種為康熙二十年(1681)之後逐漸形成定制的秋獮大典，地點是在熱河關外的木蘭圍場。清帝每次木蘭行圍，從出紫禁城開始到回紫禁城為止，大約為時三個月，因為規模浩大，故並非年年舉辦。⁴⁷

南苑在北京外城南郊，總面積比整個北京城還大。此處自元蒙古帝國都北京以來，即是皇家競技校獵場。明永樂時期開始在南苑四周築起圍牆、宮門、行宮、橋道、高臺等設施，由上林苑監管。清帝國繼承明制，將南苑圍牆從土堤變為磚牆，增建行宮與道觀廟宇，由內務府奉宸苑統籌管理。苑內佈滿了森林、湖泊、濕地，以及各種野生動植物，亦有皇家馬圈。⁴⁸對大清帝國而言，南苑是皇家園囿，訓練皇子們打獵騎射等武事的場域，也是帝國武成的展演場。順治大概是大清諸帝中，最喜歡駐蹕南苑的皇帝。根據《清實錄》的記載，他在此避痘、宴請扈從諸臣、接見蒙古親王與達賴喇嘛，甚至於順治十七年(1660)端敬皇后(即董鄂妃，1639-1660)葬禮之後，順治「是以駐蹕南苑，間幸郊原，聊自寬解，以慰臣民」。⁴⁹也因為順治朝時在南苑進行了許多開創性的朝儀典禮，包括八旗將領率師出征前皇上親自授旗、武

戲源流關係試探》，頁 136-159。感謝秦嘉嫻提供筆者此條資料。

47 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 16，頁 172-178；畢梅雪、侯錦郎，《木蘭圖》，頁 24。

48 劉侗、于奕正，〈南海子〉，《帝京景物略》，卷 3，頁 135-136。

49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143，順治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頁 1101。

成班師回朝皇帝與部將一起祭旗纛、皇帝親試武舉、率三品以上漢官及翰林科道閱兵等儀典，使南苑從原本殘破的故明皇家園囿，逐漸轉為大清帝國神武的象徵。整個南苑，可視為開放的劇場空間，人與動物共同演出讚頌大清武功的儀式。

以南苑晾鷹臺為舞臺中心，大清王室會定期或不定期的舉行三種展現帝國武功的儀式。一為八旗大閱儀式，是極為隆重的皇帝閱兵大典，八旗鐵騎的馬匹是參與此盛事的主要動物成員。⁵⁰二為年度的春蒐大狩，通常是在春天皇帝謁陵掃墓結束之後，即進駐南苑舉行春蒐，以行圍訓練武技，整場儀式的高潮為殺虎之典，參與的動物包括幫助獵人的獵狗獵鷹、作為獵物的園內野生草食性動物、以及虎熊等肉食大型動物。三為每年五月份舉辦的八旗走馬競技，騎士在晾鷹臺前進行60里距離的競速賽馬，皇帝依名次獎賞內府所製之精緻綵緞。⁵¹過程中，人馬密切配合，馬成為人身體與意志的延伸。⁵²整體而言，在南苑空間上演的皇家儀式，不脫壯盛軍容、帝國強大武力，與絕佳速度等表演主題。

大清南苑大狩行圍之制成立於康熙時期(1661-1722)，由奉宸苑負責統籌規劃，參與者除了皇室男性成員與內閣大臣之外，主要是駐紮京師的八旗統領與各旗官兵，以列陣合圍方式完成儀式。根據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內關於「巡幸儀」之規定，大狩前一天，先派人去圍場

50 張瓊，〈清代皇帝大閱與大閱甲冑規制〉，頁 89-103。順治皇帝訂三年一度大閱之制，但大清諸皇帝並未依此制固定舉辦大閱儀式。大閱地點主要在南苑，少數亦可能在盛京、古北口等地。

51 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 16，頁 177。

52 若南苑八旗走馬競技是人與馬共同表演的前臺，清廷的「馬政」則是細密的後臺管理，包括管理皇室馬匹的上駟院、管理官馬牧場的太僕寺，都是維持大清武力的重要環節之一。關於清代馬政研究，見吳青樞，〈清朝隨園官馬之研究〉；陳政國，〈清代馬政研究〉。

獵捕犧牲，以備皇帝於奉先殿告祭皇室祖先之用。然後，大狩當日，「皇帝御征衣，乘馬出宮，翊衛諸臣前引，後扈百官采服跪送，均如巡幸儀」。皇帝一行人尚未到圍場之前，「行營駐蹕護軍統領營總各一人，率護軍參領護軍校護軍先蒞其地，度地廣狹，以立御營」，並且要「禁隨駕官兵踐禾稼擾吏民，營總巡警嚴譏察止夜行，違者論如法」。等到御營帳篷都架好、皇帝也抵達駐蹕之後，由「兵部頒行圍禁令」，皇帝會為這次的行圍儀式「欽命統圍大臣數人」。統圍大臣們選定後，「先蒞圍場，按旗為隊，分兩翼斜行成列，各置旃以為表，前哨左右用藍，兩協左白右紅，中軍用黃」，等隊伍排列就緒之後，才是正式圍獵的開始。此時「前哨馳而進，則後隊以次隨發，繞圍場蟬聯環匝由遠而近，毋差池毋間斷」，列陣合圍慢慢把範圍縮小，許多林中動物已被緊密的列陣圍在場中央。等著「皇帝臨圍場，親御弓矢圍合，獸突，皇帝發矢殪之」，皇帝沒射中的動物，「御前大臣侍衛咸射軼於圍外者，從官追射」。以上是一般的獐、鹿、兔等動物的合圍過程。如果「遇大獸，虎槍官兵從之」。虎槍營是特種部隊，專門對付大型猛獸。行圍結束之後，「既獲獸，各比次其類以獻」，在眾目睽睽之下，將獵物按類別排開檢視。然後，「駕還行營，[皇帝]以所獲獸分頒扈從諸臣，大狩禮成」，並且「賜燕賞賚有差」，皆大歡喜地拔營回紫禁城。⁵³

南苑行圍儀式過程中的最高潮，是虎槍營勇士在眾目睽睽之下演示人虎近身搏鬥。然而，不同於人跡罕至的木蘭圍場，南苑地處京城郊區，而且皇室定期以人為方式獵殺肉食性動物以維持森林裡草食性動物的穩定數量，要在森林裡不經安排地「遇大獸」以便完整演出田獵大戲是困難的，或許因而衍生出虎城的存在。每年春蒐典禮前，虎

⁵³ 《欽定大清會典》，卷 61，頁 9-11。

城裡圈養的猛獸就可能被選中，成為春蒐時表演被獵殺的犧牲。奉宸苑會事先將圈養於虎城內之猛虎移出，關在層層粗繩捆綁的獸柙裡，運至南苑晾鷹臺廣場前以備虎鬥儀式之用。根據吳振棫《養吉齋叢錄》的詳細記載，春蒐殺虎儀式，先以快馬將虎柙繩索解開，再以獵犬激怒猛虎，刻意使猛虎出柙，然後虎槍營侍衛迅速挺虎槍與虎近身搏鬥刺擊之，進行獵殺的儀式表演，直至虎慢慢掙扎至死。皇帝會以白金或荷包獎賞頭兩位用虎槍刺殺老虎成功的勇士。⁵⁴春蒐儀式上除了表演殺虎外，也可能以同樣模式擊殺豹、熊等猛獸，可從乾隆四阿哥履端親王永城(1739-1777)的詩作〈二月四日駕幸晾鷹臺觀虎槍營人殺熊一豹一虎三因賦長歌紀事〉中得知。⁵⁵目前藏於聖彼得堡彼得大帝人類學與民族學博物館(Kunstkamera)一幅署名「鮑士鐸」的訂製風俗畫，便描繪了上述之儀式橋段。畫面左下方的虎已身中四槍，場中央關著一頭猛虎的獸柙閘門即將開啟，而右下方士兵扛著兩個獸柙，內部分別是一熊一虎，即將上場接受虎槍營勇士的挑戰。⁵⁶

為了能讓猛獸們成功的配合演出，後臺虎圈的實際管理與運作也必須確保無誤。虎圈裡的老虎並非如動物園般為著長期馴養，而是獵捕之後暫時圈養以待春蒐儀式時輪番上陣。虎圈因地點不同，或歸圓明園，或歸暢春園管轄，負責管理的雜役工作內容包括「晨起設食暮除糞」等等。⁵⁷虎圈內猛虎的食物來源，則由「慶豐司於倒斃牛羊肉斤內交送，如遇天氣炎熱肉斤臭變或不敷用，則於慶豐司齒老殘廢不堪餒

⁵⁴ 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16，頁6。

⁵⁵ 愛新覺羅·永城，〈二月四日駕幸晾鷹臺觀虎槍營人殺熊一豹一虎三因賦長歌紀事〉，《皇清文類續編》，卷69，頁212。

⁵⁶ 此畫圖像，請見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楊玉君教授演講「俄羅斯館藏中的晚清圖象」紀要〉，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498，擷取日期：2018年6月18日。

⁵⁷ 祝德麟，《悅親樓詩集》，卷3，〈虎城觀虎歌〉，頁27。

養羊隻內交送」。⁵⁸內務府轄下所屬的各生產與管理單位，可以支應彼此的供需，成為一個完整的動物生產消耗鏈。不過，虎圈管理員的確曾有失職而發生意外事故，致使猛虎出柙傷人。根據錢泳(1759-1844)《履園叢話》對嘉慶二十五年(1820)暢春園虎吃人始末的記載：「嘉慶庚辰五月廿七日，京師雷雨夜作，暢春園虎圈之虎忽逃其一，次早有中貴人三在前湖看荷花卒遇之，虎食其一，兩人躍入水中獲免。越五日奉旨命三額駙殺虎。」⁵⁹虎被三額駙擊殺之後，判暢春園虎圈看守者泰德失職過失殺人，致使猛虎出柙斃人命，著枷號兩個月的刑罰。⁶⁰

京城內設有圈養大型肉食性猛獸的虎城，是自明帝國以來即有的傳統，雖然是為了春蒐儀式需要而存在，但不少人認為虎城無用且浪費民脂民膏。道光五年(1825)，福建詩人張際亮(1799-1843)，進京參加科舉考試，參觀圓明園虎圈，留下〈虎圈行〉一詩。根據他描述，圓明園虎圈養了三虎三熊一豹，參觀者只要付「百錢」，管理員(圈奴)便可以允其觀賞餵食表演，「投以羊豕據地號，爪牙森動天蕭騷」。其詩末特別憂心猛獸餵食表演的管理風險，並提醒「圈奴飼虎如飼人，慎勿逸出傷吾民」。⁶¹張際亮當時的擔憂，21年後因為大清皇室財務拮据而解除。道光二十六年(1846)春天，道光皇帝(1820-1850在位)按照慣例「謁陵回鑾駐蹕南苑圈圍射虎以示武」，不過，這是最後一次在春蒐時進行射虎儀式，皇帝決定未來春蒐時不再進行殺虎表演。因此「虎城拆卸變價以裕國帑，虎槍營工費裁撤」，將圈養設備拆卸變賣，連虎槍營的工費預算都被刪減，皇家虎圈從此消失，南苑春蒐儀式亦隨之快速式

58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 165，頁 47。

59 錢泳，《履園叢話》，卷 14，〈暢春園虎〉，頁 390。

60 祝慶祺，《刑案匯覽》，卷 12，頁 405。

61 張際亮，〈虎圈行〉，收入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卷 138，頁 24。

微。⁶²事實上，道光皇帝廢虎圈的決定，究其原因可能是南苑森林獵場已逐漸被租戶開墾為農田，進行農事生產，使林地變成農地，野生動物數量驟減，無法行圍，道光皇帝於道光十八年(1838)不得不「著盛京將軍於每年解送鹿隻之便，將活麋十餘隻或二十餘隻，一併解交」⁶³，還為獵場管理不當而懲處南苑總管。⁶⁴到了同治七年(1868)，翰林院侍讀鐵祺上摺奏請開墾南苑，暫時被御旨駁回。⁶⁵不過，開發南苑的討論在朝中從未停止過，到了光緒二十八年(1902)「南苑督辦墾務局」成立，讓旗民放領開墾南苑獵場成為農地。⁶⁶正式結束了南苑作為皇家園囿暨演武空間的祖宗之制，也結束了春蒐儀式中虎槍營「遇大獸」的殺虎表演。從此，皇室成員並虎槍營勇士們，不再與猛獸們同臺演出你死我活的劇碼。

綜上所述，圍繞著春蒐秋獮的大狩，可說是「獵——養——殺」的猛獸觀演模式之循環。即木蘭圍場秋獮儀式中，虎槍營侍衛當場獵殺虎豹熊等猛獸；並且將生擒之虎熊幼獸，暫時置於京城虎圈裡飼養，開放給願意付錢並擁有恩准特權的大清臣民觀賞猛獸餵食秀；⁶⁷最後則是南苑春蒐儀式，虎槍營勇士將原本圈養於虎圈之猛虎，在儀式中進行困獸之鬥，以表演成功擊殺。⁶⁸在帝國規訓動物身體的權力場域

62 奕賡，《括談》，卷下，頁 18。

63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309，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十三日，頁 815。

64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309，道光十八年閏四月二十一日，頁 816。

65 《清實錄·穆宗毅皇帝實錄》，卷 248，同治七年十二月十日，頁 455。

66 關於南苑在清代歷朝的演變，見劉仲華，〈「足民食」與「祖宗之制」的抉擇——嘉道以後南苑私墾查禁與招佃墾種之議〉，頁 86-95。

67 乾隆在皇子時期曾參與一次木蘭行圍，當時虎槍營勇士不僅殺一母虎，並擒獲三隻幼虎，將之圈養於虎圈內。清高宗，〈猛虎行〉，《樂善堂全集》，卷 22，頁 17。原詩作：「可憐三子亦被擒，穿裏同來入虎圈。虎圈晨開鐵作門，聊憑一息定驚魂，乞生也向人垂首，昔日威風今何有？」

68 不過，因為木蘭秋獮儀式並非每年都舉行，亦非每次都能生擒幼獸，因此

裡，虎圈是春蒐秋獮儀式前臺與後臺的中介空間，作為皇室儀典之延伸，讓無緣親身參與儀式之觀眾，透過隱匿於後臺的日常情境，想像春蒐儀式正式上演時的畫面。也就是說，如果南苑晾鷹臺是殺虎表演的前臺，虎圈就是演出後臺的日常實際，以供被恩准之參觀者，如藩屬國使臣們，進入這個後臺日常場域，接受園吏導覽，參觀帝國權力運作如何及於禽獸。後臺，是因為前臺而存在著。

而這類原屬於後臺式的、擁有特權才能取得的參觀經驗，在二十世紀初期轉為公共動物園之後，後臺將變成前臺，皇家日常將成為城市仕紳付費購票即可享用的娛樂儀式。

四、農事試驗場與附設動物園

南苑從獵場逐漸成為農地的過程，凸顯了大清皇室與動物之間的權力關係，逐漸從「擊殺降伏」，轉變為「生養萬物」。而這樣的轉變，可說是農事試驗場誕生的前提。

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的整體規劃，包含兩大外來概念，一是為擴增農產量與產值之農事試驗場概念，二為自然史科學研究脈絡下的物種蒐集並展示場域，包括(自然史)博物館、動物園與博覽園。然而和歐美的城市動物園相較，慈禧以皇室土地所贊助興建的是有著附屬動物園功能的「農事試驗場」，主要目的是農事試驗場而非動物園。所以我們仍需回到「農事試驗場」概念，來分析其對慈禧新政的意義。⁶⁹

虎圈內的猛獸，部分來自於盛京將軍或吉林將軍率部眾圍獵所獲以進獻皇室。見《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32，道光二年閏三月五日，頁569。即使如此，上述「獵——養——殺」的猛獸觀演儀式循環，基本上仍是可成立的。

⁶⁹ 目前筆者蒐集到3期農事實驗場的官方報告，包括葉基禎，《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報告第一期》(1909)；農事試驗場，《農商部農事試驗場成績報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四日(1898年8月20日)，光緒帝下詔「兼採中西各法振興農學」，設立「農工商總局」，負責推動中國農業現代化。庚子之亂後，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設「商部」，三十二年(1906)將工部併入商部，成為「農工商部」，掌管全國農工商行政，以中央政府部會層級推動全國農業改良。⁷⁰同年，農工商部尚書載振(1876-1947)發起籌建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於「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廿二日奏請，就西直門外樂善園官地撥作試驗場，並附設高等農學堂，派本部司員祝瀛元，陸大坊為提調，胡宗瀛等為場長」。⁷¹不僅種植從帝國境內各省徵集來的物種，大清國駐外使節與各國華僑商會亦提供具經濟價值的外國物種，在北京實驗繁殖。⁷²農事試驗場初期開辦經費共 20 萬兩銀元，農工商部撥款 10 萬兩銀元，南洋大臣端方(1861-1911)與北洋大臣袁世凱(1859-1916)各自公庫內出資 5 萬兩銀元。⁷³由皇室內務府出地，農工商部與南洋、北洋公庫共同出資籌建的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正式成立。

在人事制度上，農事試驗場下分六科，樹藝科、蠶桑科、畜牧科負責農業實驗部分；書記科、會計科、庶務科處理場區的行政管理與營運；另有兩個獨立科別，即動物科與博物科，負責管理動物園與博物館。各科皆設有科長與科副，並技術人員。⁷⁴不過，傳統科舉教育

告》(1914)；農商部中央農事試驗場編，《農商部中央農事試驗場第三期報告》(1916)。

⁷⁰ 穆祥桐，〈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頁 22。不過，在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成立之前，直隸、湖北、湖南、山東、山西、河南、福建等地方已先行開辦省級農事試驗場。

⁷¹ 丁進軍，〈清末商務史料(下)〉，頁 48。

⁷² 黃小茹，〈清末農事活動的行政支撐和社會參與——以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的匯集活動為例〉，頁 11-17；王奎，〈商部(農工商部)與清末農業改良〉，頁 9-12。

⁷³ 楊小燕，〈民國時期北京的兩個農事試驗場〉，頁 265。

⁷⁴ 葉基禎，《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報告第一期》，〈本場章程〉，頁 23-24。

無法培養能推動農業現代化、動物園與博物館的專業管理人才，必得聘用外國技師，並啟用新式教育養成的人才，所以農事試驗場首任場長之一葉基禎，畢業於日本帝國大學農科；⁷⁵動物園首任科副是京師匯文大學堂肄業生李增寶，博物館首任科副是京師大學堂博物實習科畢業生魯士昌。⁷⁶

在空間區位劃分上，農事試驗場主體是廣大的五穀雜糧種植地、果樹、與花卉植物苗圃，河流水塘等灌溉設施遍佈全場，其中點綴著包括皇室行宮在內的中西式建築園林；而與動物相關的三座館舍，包括動物園、蠶桑館、博物館，則集中於大門鄰近的左右兩側(見圖2)。

圖2 農事試驗場全圖



說明：A.動物園，B.正門，C.蠶桑館，D.博物館，E.暢觀樓，F.卍字樓，G.東洋樓
資料來源：葉基禎，《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報告第一期》，圖版10。

⁷⁵ 農事試驗場，《農商部農事試驗場成績報告》，〈前任職員一覽表〉，頁1。

⁷⁶ 葉基禎，《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報告第一期》，〈附錄〉，頁89-90。

由皇家園林改裝的農事試驗場，整體空間規劃包括中式、西式景觀，同時，首開風氣附設西餐廳、咖啡館等。場區內最主要的代表性建築為皇家行宮「暢觀樓」，是慈禧與光緒視察此地時的駐在地點，採三層歐式西洋樓風，內部陳設傢俱亦為西洋式，建於光緒二十四年，主要由樣式雷家族的雷廷昌(1845-1907)設計。⁷⁷來遠樓內設北京最早的番菜館(西餐廳)，南側的玻璃屋則為咖啡館；翫風堂、觀稼軒、萬字樓皆設茶館供遊人休憩；園內還有一座鏡真照相館。⁷⁸為了使農業試驗場具有收入效益，場方引進具娛樂效果的商業經營策略，使得以振興農業為初衷的農事試驗場，同時成為二十世紀初北京旅遊指南裡的重要地標。在整個場區正式全面對外開放的前一天，即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1908年6月15日)，翰林院編修徐兆璋(1867-1940)在日記中提到：

驅車竟至三貝子花園，先在翫風堂啜茗，復至暢觀樓，陳設極華麗，地勢甚高，可以一覽無餘，中多太皇太后御筆，有古柳一株，已朽，數百年物也。後至動物園，虎豹獅象皆具，中惟禽鳥一類最多，五色爛然，頗足悅目，西人來觀者極多。……歸途見車龍馬水，仕女極盛，皆由此中歸者。植物分科佔地極廣，卻多幼稚，數年之後綠葉成蔭，必更足令遊人駐屐也。⁷⁹

可見園區雖然剛規劃完成，但已達到一定的參觀規模。

農事試驗場的附設動物園，雖然占地僅 1.5 公頃，卻是大清國第一座正式對公眾營運的動物園，也是繼日本東京上野動物園(始於 1882 年)與京都市動物園(始於 1903 年)之後，東亞第三座官方營運的公共動物園。至宣統元年(1909 年)為止，農事試驗場動物園內已包括「獸亭三座、獸舍四十余間，鳥室十間，水禽舍、象房、鳥獸繁殖場及動物標本陳列室各一

77 何蓀潔，〈清代建築樣式雷世家〉，頁 45。

78 葉小燕，《北京動物園志》，頁 49-62。

79 徐兆璋，《徐兆璋日記》，第 2 冊，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頁 974。

室，展覽動物共約八十餘種七百只」。⁸⁰這些動物「由南洋大臣端方在德國選購，解寄到部，園中所需檻柙亭舍，刻已位置適宜，修蓋完整，不特靈囿靈沼遠符周制，亦且多識禽獸，足為開通國民知識之資」。⁸¹

事實上，農事試驗場動物園的動物來源極為複雜，一部分由農工商部要求各省將所產之特殊動物送至北京，以擴充動物園規模；⁸²一部分則是三次大規模的從國外進口。第一次是因慈禧派遣五大臣至歐、美、日考察各國憲政制度與實業發展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於光緒三十二年五月(1906年6/7月)考察德國時，以白銀 29,704 兩購買了準備要成立萬牲園的動物，共計 59 籠。⁸³第二次是三十四年七月(1908年7/8月)，農工商部再度「派員赴非洲採購珍禽奇獸以備萬牲園之用」。⁸⁴第三次是宣統二年十月(1910年11月)，「又由外洋購到大猩猩及白猿白頭墨猿定星猴等動物」，以擴充動物園的收藏。⁸⁵而清皇室既有的西苑百鳥園與百獸園，是否提供任何動物，目前筆者尚未發現任何官方檔案資料能說明此點，有待未來更多研究成果以解答之。⁸⁶

⁸⁰ 楊小燕，《北京動物園志》，頁 49。

⁸¹ 葉基禎，《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報告第一期》，〈奏章恭錄〉，頁 6。

⁸² 〈電催各省購送動物〉，《大公報》，1907年7月4日，第4版。

⁸³ 白銀 29,704 兩包含動物本身並海運到上海、天津再由陸路送北京的整體費用，見楊小燕，《北京動物園志》，頁 78。

⁸⁴ 〈京師近事〉，《申報》，1908年8月10日，第5版。

⁸⁵ 〈增添動物〉，《大公報》，1910年11月11日，第4版。

⁸⁶ 不過，根據《北京動物園志》，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慈禧曾「將其喜愛的一只小猴御賜動物園。王公大臣也仿效慈禧，紛紛將所養的動物送給動物園」。見楊小燕，《北京動物園志》，頁 79。農事試驗場的正式報告中，並未記錄動物園動物種類清單，因此目前無法得知 1908 年動物園剛啟用開放時，究竟園內圈養多少動物種類。不過，1912 年 9 月 25 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師生參觀萬生園，詳實記錄當時園內的動物與植物，見〈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參觀萬生園報告書〉，頁 24-39。

除了自德國進口動物之外，農事試驗場也自德國引進動物飼養與管理機制，而非使用內務府或奉宸苑既有的皇室動物管理機制。農事試驗場一開始以兩名德國專業技師，搭配數十名本地學徒為動物園管理主力。⁸⁷隨即發現人力不足，動物多有損傷，因而多聘兩名專員配合德籍專業技師，共同管理動物。⁸⁸

在農工商部於光緒三十二年提出農事試驗場的整體構想之前，慈禧是否已有管道認識歐洲的公共動物園馴養與管理模式，因而力促農事試驗場內附設動物園？早在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醇親王載灃(1883-1951)奉慈禧之命為庚子事件善後而出使德國道歉時，便已參觀過柏林動物園，他在日記中寫道：

午后同張、蔭兩侍郎，李提督希德等往觀柏林獸園。園方廣不止一方英里，走獸如虎豹犀象獅熊駱駝獼猴海馬海虎山羊野豬斑馬等，飛禽如雕鷹梟隼鸚鵡山雞野鶩等難以殫述。禽如鴛鴦鳥獸如袋鼠，皆中華所無。園中遊人甚眾，每人進門費一馬克。園內設酒館樂堂，以備遊人之需。該園提調聞余來，即迎導游觀，遍歷各處。⁸⁹

慈禧有可能經由載灃的描述，早已聽聞德國動物園的盛況。

而端方與戴鴻慈(1853-1910)奉慈禧之命出洋歐美考察憲政回國之

87 「添派學生多名，專供餵養禽鳥之事，其飼養猛獸則由所僱之德人專任其事，其月薪德人二名每名月支洋西十元，學生十餘名，每名月支五元，業經該園總辦稟准部署矣。」〈動物園之概略〉，《大公報》，1907年7月4日，第5版。

88 「萬生園添派科員。農工商部以萬生園動物迭見傷損，非添派專員認真整頓不足以示慎重。茲已由部劉派譯員紹竹庭等二君為該園動物科科員以期悉心籌畫俾該園辦法日益完善云。」〈萬生園添派科員〉，《大公報》，1907年10月19日，第4版。

89 載灃，《醇親王使德日記》，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頁372。

後，於光緒三十二年十月(1906年11/12月)會奏給慈禧、光緒兩宮的〈各國導民善法請次第舉辦摺〉中，強烈建議從京師開始，實施四項文化治理政策，即建立圖書館、博物院、萬牲園、公園。⁹⁰此奏折中並分析這四類歐美重要的文化機構，在大清既有的執政基礎上並不難達成。因為乾隆皇帝《四庫全書》完成之後，在「杭州鎮江揚州分建諸閣」，即是公共圖書館的前身；而博物院的基礎可以站在「中國古時器物之精良實為全球各國所不逮」的優勢上；創立萬牲園與公園亦非難事，因為「中國曠地尚多不難隨時經畫」。不過，早在向兩宮上〈各國導民善法請次第舉辦摺〉之前，端方已經先行透過駐德大使居中聯絡，向漢堡動物商卡爾·哈根貝克(Carl Hagenbeck, 1844-1913)購買了準備要成立萬牲園的動物，將於三十三年五月(1907年6/7月)從歐洲運上海。⁹¹端方下訂這批動物時，商部雖已於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1906年4月15日)上呈〈商部奏請撥官地興辦農事試驗場摺〉，但此奏摺中只提及設置農事試驗場，尚未進入詳細規劃，亦未提及場內要有動物園一事。端方預先購置動物的目的，究竟是出於己意，或慈禧授意，目前尚難從史料中確認。不過，三十二年十二月(1907年1/2月)農工商部為籌備京師農事試驗場，開始發文向各省徵集動植物，而同為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的民政部尚書徐世昌(1855-1939)，親自會面端方，建議端方把德國購置的外洋動物轉讓給農工商部，作為農事試驗場開辦萬生園之用。⁹²不管是出於慈禧之主動授意，或出於農工商部尚書載振，或民政部尚書徐世昌，或南洋大臣端方，甚至隱藏在背後的袁世凱之揣摩上意，五大臣出洋考察之後，進入預備立憲時期，在慈禧太后主導的清國最後一

90 〈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戴端會奏各國導民善法請次第舉辦摺〉，頁1-2。

91 後來，這批動物到達上海之後轉運天津，自天津以火車運至北京。見〈本埠選購禽獸裝運入京〉，《大公報》，1907年6月5日，第5版。

92 楊小燕，《北京動物園志》，頁108；朱光華，〈清代動物園〉，頁34。

波強力政治革新風潮下，北京農事試驗場動物園就這樣誕生了。

動物園的出現，標誌了人類收藏並圈養野生動物方式的改變，由前現代的「展示用獸圈」(menagerie)發展成具有現代意義之「動物學的花園」(zoological garden)，前者以動物展示主人的特殊社會身分；後者滿足城市中產階級的獵奇式觀察。亦即，透過這些來自異域的動物，可在歐洲城市內體驗親臨非洲或亞洲的幻覺。⁹³十九世紀歐美城市中產階級大量興起，城市動物園陸續誕生，至 1903 年為止，歐洲各國具一定規模的城市公共動物園共計 36 座，其中德國就占了 16 座。⁹⁴端方等五大臣出洋參訪，正好趕上這股動物園現代化風潮，因此將各種動物齊聚一堂的「萬牲園」，視為具教育功能的「導民善法」之一，頗具西方現代性思維。⁹⁵

售予端方整批外洋動物的德商卡爾·哈根貝克，是現代動物園展示模式的創始者，被當時的英國觀察家譽為「動物貿易之王」(king of animal importers)。⁹⁶他的貿易網絡遍及全球，同時以馬戲團、動物園、人種博覽會等展演形式，為觀眾開創現代性的觀看經驗，將科學與奇觀融為一體，充分展現十九世紀的視覺文化革命。⁹⁷卡爾·哈根貝克一

⁹³ 1793 年於巴黎成立的植物園(Jardin des Plantes)，是以路易十三時代(1610-1643)開始建置的皇家植物園為基地，於法國大革命之後成為公共植物園，裡面亦包含了世界最早的城市動物園，即植物園附設動物園(Ménagerie du Jardin des Plantes)，其動物來源主要是原來圈養在凡爾賽宮皇家園圃的動物。見 John Scott,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t Paris, Commonly Called the Jardin des Plantes," 401-419.

⁹⁴ Charles Victor Alexander Peel, "Contents," in *The Zoological Gardens of Europe: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Features*, vi-vii.

⁹⁵ Nigel Rothfels, *Savages and Beasts: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Zoo*, 19.

⁹⁶ Charles Victor Alexander Peel, *The Zoological Gardens of Europe*, 232.

⁹⁷ 卡爾·哈根貝克是近代動物園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關於此人的現代動物園事業研究專書，Nigel Rothfels 梳理了哈根貝克公司檔案，分析其龐

改過去以鐵鍊或狹小鐵柵欄圈養動物並限制其自由的方式，發展出當前大眾熟知的現代動物園空間，即以樹石等自然材料，為每種動物打造近似其野外原生環境的專屬人造圈養空間，提供歐洲城市大眾享受快速轉化視覺經驗遨遊世界的可能性。⁹⁸可見端方當時的確是不惜重金，找上最知名的德國動物交易商，以建構大清國第一座動物園。

我們不難理解慈禧贊助農事試驗場以提升農業產量的務實做法，以及設置一座風行歐洲的動物園，以提升大清皇室國際聲譽的企圖心。以同樣的邏輯，也可以說明，農事試驗場附設博物館對大清皇室的必要性。事實上，慈禧對博物館並非一無所知，在她過去的執政經驗中，曾經完整接收了由譚微道主持的北京第一座自然史博物館，即「北堂百鳥堂」。此接收經驗對農事試驗場附設博物館的整體建置，在概念或執行手段上，或有重要影響，以下試論之。

五、農事試驗場附設博物館

根據宣統元年(1908)的農事試驗場組織章程，「博物館」基本上是

大的動物收集與展售事業，見 Nigel Rothfels, *Savages and Beasts*. Eric Ames 則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視覺文化出發，探討卡爾·哈根貝克作為著名動物交易商，與當時展示各式各樣新奇事物的娛樂產業之間的關係，見 Eric Ames, *Carl Hagenbeck's Empire of Entertainments*.

⁹⁸ 正因為哈根貝克龐大的全球動物貿易事業，使得二十世紀初德國境內各主要城市，都有一座城市動物園，羨煞英國的動物園觀察家們。例如，Charles Victor Alexander Peel 等寫到 “Almost every large town in Germany has its Zoological Garden, and, as it usually contains a concert-hall and other similar attractions, people flock to it, and are insensibly led to take an interest in the wild animals which they see around them. It seems to me a pity that we do not make our few English Gardens equally attractive.” 見 Charles Victor Alexander Peel, “Preface,” in *The Zoological Gardens of Europe*, vii-viii.

一個製造與陳列動植物標本並農業展示的主題館。⁹⁹雖名為「博物館」，但與歐美集蒐藏、研究、教育、展示等功能於一身的自然史博物館尚有一段距離。到了 1914 年，農事試驗場的新組織架構裡，博物科改名「剝製標本室」，職員只有 2 名，魯士昌與劉樹芳(1892-1952)。¹⁰⁰至 1916 年，魯士昌身兼「動物科長兼剝製課主任」，原先與動物科平行的博物科，已降級為「剝製課」，附屬於動物科。¹⁰¹從組織名稱與科層結構的演變，筆者推測宣統元年設立的「博物館」規劃構想，可能因為經費與人才不足，未完整實現，退而成為「剝製標本室」。¹⁰²

在農事試驗場成立之前，大清皇室已開始收藏動物毛皮標本。十八世紀大清皇室圈養的肉食性猛獸，被虎槍營勇士獵殺後，有可能被造辦處工匠「槓置」在木模上，變成動物標本，展示在藏傳佛教祭殿內，作為帝國神武力量的象徵。此類標本是為了宗教信仰目的而存在，並非為了自然史知識而公開展示。

關於大清王室猛獸槓置的記載，初見於康熙時期。康熙皇帝於二十二年(1683)，西巡往五臺山，回鑾途中，在臺懷附近山林溪澗旁遇虎，康熙立即拉弓射箭，一發即中而虎斃，射虎處因而被命名為「射虎川」，

⁹⁹ 葉基禎，《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報告第一期》，〈本場章程〉，頁 26。

¹⁰⁰ 農事試驗場，《農商部農事試驗場成績報告》，〈現任職員一覽表〉，頁 6。

¹⁰¹ 農商部中央農事試驗場編，《農商部中央農事試驗場第三期報告》，〈職員一覽表〉，頁 79。

¹⁰² 事實上，清末農工商部擘畫的農事試驗場，結合了農學與博物學領域，整個場區在二十世紀之後，也在農業民生或生物科學研究這兩大領域之間擺盪。1929 年，國民政府將「中央農事試驗場」改組為「國立北平天然博物院」，隸屬於「國立北平研究院」下「生物部」的學術研究單位之一，由當時的國立北平大學校長李煜瀛(1881-1973)擔任院長。但是到了 1934 年，「國立北平天然博物院」的管理權，由「國立北平研究院」轉移至「北平市政府」，再度易名為「北平農事試驗場」，由北平市市長擔任場長。見楊小燕，《北京動物園志》，頁 48。

該虎皮被製作成標本「楨置」於臺懷菩薩頂寺中，以紀念康熙以聖王天子之尊「除民災」的神武事蹟。¹⁰³乾隆皇帝幾度西行經過射虎川，皆賦詩緬懷祖父在此殺虎的英勇事跡。¹⁰⁴從乾隆的詩，可以得知乾隆二十六年(1761)，他第三度西巡五臺山時，此虎標本仍置於該寺中。¹⁰⁵

目前所知，乾隆朝時期的雍和宮東配殿裡亦有熊、虎、狼、豹的動物「楨置」標本陳設各一對。根據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月造辦處活計檔皮裁作的記載：

十八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呀嗎達嘎壇內配做虎二對熊二對先呈樣欽此。於正月二十五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先傳做之虎二對熊二對，各做一對，再添做狼一對豹一對欽此。於二十六年七月初九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為靉普福宮熊一對，行文吉林將軍揀選寬大熊皮八張，送來應用繕摺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知道了。於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吉林將軍送到熊皮八張外備用熊皮二張。於二十七年五月初三日催長葆光將做得熊虎狼豹等持赴原處安訖。¹⁰⁶

這四對猛獸標本，內務府造辦處花了兩年時間製作。到了乾隆四十年(1775)，雍和宮東配殿的豹虎標本因為損毀，必須重新製作：

二十八日接得員外郎六格押帖一件，內開正月十一日雍和宮來

103 清聖祖，《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2集，卷34，〈射虎川臺麓寺碑〉，頁11。

104 清高宗，《御製詩集》，第2集，卷11，〈射虎川〉，頁15；第4集，卷8，〈射虎川〉，頁4；第5集，卷72，〈射虎川〉，頁2。

105 清高宗，《御製詩集》，第5集，卷21，〈射虎川〉，頁34。

106 〈乾隆二十五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25冊，皮裁作，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十八日，頁329。

帖一件，內開本處盪得雍和宮東配殿內呀慢嚩嚩佛前陳設之熊虎盪樣一座，虎一隻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舊虎糟朽不用，著如意館新做豹一對虎一對，其豹身與舊虎一般大，虎身著放大些，欽此。於本日接得員外郎六格押帖一件，內開二月二十六日太監胡世傑傳旨，如意館現做虎一對豹一對，向造辦處要楠木匠成做，著仇忠信指示。¹⁰⁷

根據以上兩段活計檔的記載，大致可以想像雍和宮東配殿內的動物標本，是用楠木雕成熊虎身體模型，再包覆處理過的整張熊虎皮毛而成，頗似 1905 年烏居龍藏(1870-1953)在滿洲調查過程中所攝之照片中，奉天清寧宮陳設的一對熊標本(圖 3)。乾隆時期興建的 7 處專門供奉藏傳佛教大威德金剛戰神呀慢嚩嚩(Yamāntaka 即文殊菩薩 Mañjuśrī)的祭壇，有 4 處陳設熊虎等猛獸「植置」標本，包括永安寺善因殿、圓明園清淨地、圓明園舍衛城普福宮、安遠廟雅曼達嚩壇等。這些植置猛獸，與御用兵器戰袍等，一同供奉在呀慢嚩嚩佛的祭殿內。¹⁰⁸

107 〈乾隆四十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38 冊，如意館，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八日，頁 6。

108 王家鵬，〈清代皇家雅曼達嚩神壇叢考〉，頁 98-121。

圖 3 1905 年鳥居龍藏拍攝於奉天清寧宮內部照片



資料來源：東京大學綜合研究資料館所藏，《鳥居龍藏博士攝影寫真資料》，第 3048 號。
東京大学総合研究資料館特別展示実行委員会編，《乾板に刻まれた世界——鳥居龍藏の見たアジア》，頁 125。

現代西方剝製標本製作技術(taxidermy)傳入中國之前，中國既有的動物標本製作技術，目前學界討論不多。然而從奉天清寧宮的熊標本照片來看，倒是值得探討十八世紀東西方皇室對於猛獸標本展示的觀念差異。

在蒐集、觀察、描述、紀錄、詮釋各類物種的博物學脈絡下，歐洲於十八世紀逐漸發展出成熟的動物剝製標本技術。¹⁰⁹剝製技術演進

109 剝製標本是將帶有皮毛羽翼的動物皮張，經過防腐鞣製之後從生皮轉為皮

的目的，是為了達到動物死後卻栩栩如生的效果，除了滿足博物學知識的需求之外，也帶有以獵物炫耀社會地位的心態。¹¹⁰但是歐洲動物標本裡強調動物威猛的栩栩如生狀態，似乎不是清宮動物標本的展示企圖，奉天清寧宮這兩頭熊並非猛獸的生前狀態，而是以死後乖乖降伏的姿態展示。筆者推測，因為乾隆自認是文殊菩薩的化身，「降龍伏虎」或「降妖伏魔」或許是展示熊虎標本時的隱喻。而在植置標本製作技術上，或許和滿人大量毛皮交易傳統而產生的皮草使用慣習有關，將毛皮鞣製後做成皮草大衣的概念，轉化為毛皮鞣製後以木模展示，即可完成植置。不管是皮草大衣或毛皮植置，都只是動物死後的毛皮遺存展示，而非西方自然史知識脈絡下呈現動物生前狀態的「剝製標本」概念，所以「植置」是頗精準的用語，就是「把毛皮置於植上」的展示手段。植置熊虎的祭壇，除了少數皇室成員之外，唯有內廷供養的蒙古或西藏喇嘛們可以進入，定期為皇室舉行藏傳佛教的消

革，包覆在以生理解剖知識為建構基礎的假體上，姿態務求還原動物生前的實際形象。關於剝製標本在西方的發展歷史脈絡，見 Rachel Poliquin, *The Breathless Zoo: Taxidermy and the Cultures of Longing*.

¹¹⁰ 例如，十九世紀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獵人狩獵所得的動物標本，常被刻意製成威猛襲人之狀，以烘托狩獵者成功獵殺的勇氣與能力。見 Harriet Ritvo, *The Animal Estate*, 253-254. 而歐洲最知名的早期動物剝製標本之一，是曾經被法王路易十五(1715-1774 在位)飼養在凡爾賽宮皇室園囿達 23 年之久的「路易十五犀牛」(Le rhinocéros de Louis XV)，其在 1793 年死後被剝製成標本，放在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內，當時主持此剝製計畫的博物學家與標本師，特意將此亞洲犀牛已經磨損的較小犀角，置換成非洲犀牛的巨大犀角，成為一尊帶有巨大非洲犀角的亞洲犀牛標本，以凸顯其身為法國皇家園囿動物的知名歷史地位。見 A. Péquignot, “The Rhinoceros (fl. 1770-1793) of King Louis XV and Its Horns,” 213-227. 此犀牛標本照片，見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Le rhinocéros de Louis XV,” <http://www.mnhn.fr/fr/collections/ensembles-collections/vertebres/mammiferes/rhinoceros-louis-xv>, accessed June 6, 2018.

災祈福儀式，這使得「降伏」的寓意，不只有宗教性，也透過儀式過渡至現實政治場域裡。

在中國，最早向大眾公開展示動物剝製標本的機構，應是西方傳教士在上海、天津與北京設立的自然史博物館。其中，北京的自然史博物館(即「北堂百鳥堂」)，館藏共 2,474 件標本，在慈禧的主導下，於光緒十三年(1887)全數納入內務府奉宸苑皇室庫藏。

光緒十一年(1885)，慈禧欲擴建西苑，作為未來歸政光緒皇帝之後的退休住處。此擴建工程，包含與羅馬教廷協商，收回緊鄰紫光閣西苑外牆的蠶池口教堂(北堂)，另撥西什庫地建新北堂。¹¹¹蠶池口教堂收回後，亦徵收附近之 2,000 餘戶民宅，全部納入西苑範圍內。此新納入區域在內務府奉宸苑檔案中，名為「集靈囿」。¹¹²

北堂搬遷合約中，清廷亦要求接收堂內既有一切收藏。¹¹³最後，教皇首肯，蠶池口教堂內原設之百鳥堂博物館共 2,474 件各式動物標本，包括走獸、飛禽、海中珍奇、海中蟲介、中土蝶介昆蟲、外國蝴蝶蟲介、地中海螺螄、虎象熊骨、鳥卵、蟲蛇、獸角等，一併奉送清廷。¹¹⁴西什庫教堂興建完成之後，總理衙門於光緒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1887 年 12 月 8 日)派員接收蠶池口教堂之建物與館藏，建造清冊之後

111 收回蠶池口北堂之舉，不只要處理西什庫新教堂的土地與興建經費問題，還要經過複雜的外交折衝，總理衙門得協商法國政府與羅馬教廷，整個過程由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1823-1901)主事，見翁飛，〈李鴻章與蠶池口教堂遷移案〉，頁 39-46。

112 1908 年，溥儀(1906-1967)繼位為宣統皇帝，隆裕皇太后(1868-1912)批准在集靈囿興建監國攝政王府，供溥儀父載灃攝政王居住，攝政王府於 1910 年竣工，見〈集靈囿之將竣工〉，《順天時報》，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第 7 版。

113 樊國樑，《燕京開教略》，下編，頁 69；吳空，〈從天主堂到監國攝政王府〉，頁 680-683。

114 張舒影，〈物象認知與天學弘義——百鳥堂考〉，頁 207-210。

隨即轉交奉宸苑接管，並呈御覽。¹¹⁵

原蠶池口教堂附設的「北堂百鳥堂」，「館在北堂左近，內儲珍禽異獸大小無慮四千餘種，翎毛鮮潔栩栩如生。又有奇異木石金寶之類多不勝數，皆博物家所罕見者。開館後遠近聞傳爭來遊賞，王公巨卿亦多來者。」¹¹⁶而這批自然史標本正是譚微道，這位透過偷偷翻牆觀察或買通守門士兵，才得以將南苑禁園四不像麋鹿介紹至歐洲的自然史博物學家，在中國各地進行自然史調查收集而來，為典藏這些標本，故於北京設置此自然史博物館。傳說慈禧本人亦曾於未遷館之前，微服參觀此百鳥堂。¹¹⁷

譚微道收集並公開展出於北堂百鳥堂的動物標本，根據樊國樑(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 1837-1905)主教所著《燕京開教略》一書內提供的木刻版畫來看，應是剝製標本(圖 4)。隨著自然史研究而發展的動物剝製標本技術，是西方自然史學者蒐集世界物種的手段之一。在蒐集過程中，西方學者亦開始訓練在地助手製作動物標本，如英國鳥類學

115 〈本月三十日午刻派員往收蠶池口教堂由〉、〈具奏收回蠶池口教堂一摺恭錄硃批抄錄原奏知照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館藏號 01-12-024-03-017、01-12-024-03-024。

116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頁 433。

117 「孟主教由法返華隨來之傳教士中，有達味德(華姓譚)者，邃於博物之學。抵華後遍遊名山大川收聚各種花卉鳥獸等物以備格致。即於北堂創設博物館一所，內儲奇禽計八百餘種，蟲豸蛟蝶計三千餘種，異獸若干種，植物金石之類不計其數。皆博物家罕見者。開館後王公巨卿率帶眷屬日來玩賞者隨肩結轍。不久名傳宮禁有言皇太后亦曾微服來觀者。」見樊國樑，《燕京開教略》，下編，頁 36-37。百鳥堂博物館具體開館時間不甚確定，至遲於 1872 年已成為公開的博物館，因為籌辦者 Armand David 於 1874 年回法國後，此館便無專人管理，而館藏為清奉宸苑接收後，亦無公開展示，所以知名度與影響力並不如上海徐家匯博物館或天津北疆博物院。關於北堂百鳥堂博物館成立與遷建過程，見張舒影，〈物象認知與天學弘義〉，頁 202-210。

家斯代恩(F.W. Styan, 1838-1934)在 1884 年亞洲文會(Royal Asiatic Society)年度報告上寫道：「中國剝製標本技術仍處於原始初級狀態，但是任何了解此技術之人，皆可以教會當地人如何完美的剝製鳥類。」¹¹⁸譚微道收集的大量標本，或也有可能訓練了不少在地助手標本製作技術。

圖 4 北堂百鳥堂之鳥類標本



資料來源：樊國樑，《燕京開教略》，下編，頁 34-35。

為什麼慈禧要千方百計取得蠶池口教堂建物及附屬百鳥堂博物館標本館藏？奉宸苑於光緒十三年接收建物與館藏後，慈禧究竟計畫如何使用？只是增加內府的西洋物件收藏嗎？是否曾經想要將集靈園地區規劃成如法國凡爾賽宮改製成的巴黎植物園、動物園、自然史博物館等？還是另有打算？從筆者目前取得的檔案資料尚無法具體回答。不過，根據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謹擬集靈園內添修洋式點景

¹¹⁸ “Chinese taxidermy is of a very primitive nature, but anyone who understands the work himself can readily teach a native to skin birds as neat as possible.” See F.W. Styan, “Curator’s Report,” x.

樓座亭臺房間等圖樣)的樣式房畫樣,一直希望重修圓明園的慈禧,的確曾意圖將集靈囿仿建成圓明園西洋式皇家園囿,包括前有水法噴泉的海晏堂、黃花鎮、西洋門、孔雀籠等洋式建築之設計圖樣。¹¹⁹對於乾隆而言,圓明園不只是由西洋建築硬體集結成的皇家園囿,而是一座大型的、為收藏寰宇知識而存在的「萬園之園」。慈禧屢屢企圖重修於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之役焚毀的圓明園,雖屢遭勸阻,仍計畫性的要還原乾隆收藏寰宇的祖宗基業。筆者推論,慈禧清楚知道,若要重建圓明園,不能徒有建物而空無奇趣收藏,必得要硬體軟體兼具,因此,於光緒十三年大費周章輾轉取得北堂百鳥堂動物標本館藏,很有可能是慈禧圓明園復原計畫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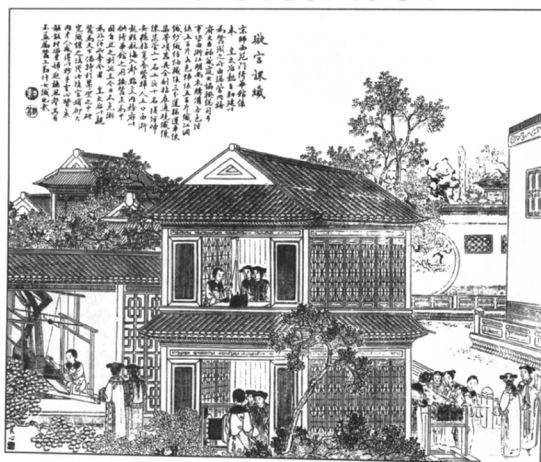
然而,隨著整修三海工程使得內務府財源吃緊,以及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件西苑遭到嚴重破壞,慈禧終究得放棄圓明園復原計畫,原蠶池口教堂建物亦被拆除,而奉宸苑接收的那批百鳥堂自然史標本,不知所蹤。¹²⁰迫使慈禧最終放棄以乾隆圓明園為藍圖的集靈囿計畫,空留設計構想圖。然而,北堂百鳥堂的系統性物種標本蒐集與公開展示之概念,卻有可能做為慈禧支持農事試驗場博物館規劃的認知前提。據說慈禧參觀農事試驗場時,曾親見剛習藝不久的劉樹芳製作喜鵲標本,並指示「日後園中凡有鳥獸鱗介亡斃者,爾等皆剝製標本,陳之於室以供眾人遊覽」。¹²¹

119 左圖、王蔚,〈海晏堂四題〉,頁 308-310。

120 張舒影,〈物象認知與天學弘義〉,頁 119。

121 見吳崢嶸,〈標本名家劉樹芳及傳人〉,頁 48-49。十九世紀末,西方動物剝製標本的在地技術轉移,主要發生在上海與北京,以上海亞洲文會博物院及徐家匯博物館的唐春營、唐啟旺(1886-1933)父子,和北京農事試驗場的劉樹芳(1892-1952)為主要人物,稱為中國剝製標本的「南唐北劉」兩大派別。見侯江、李慶奎,〈近代中國生物標本製作掠影〉,頁 55-64。

圖 5 〈璇宮課織〉



資料來源：〈璇宮課織〉，收入盧群，〈晚清社會新聞圖錄——北京舊聞〉，頁 159。

圖 6 農事試驗場蠶桑館



資料來源：葉基禎，〈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報告第一期〉，圖版 14。

雖然，以圓明園為設計藍圖的西苑集靈園從未完全實現，慈禧於光緒十六年(1890)曾指示內務府於集靈園內設置小型絲綢織造工坊，稱為「綺華館」，此館一直運作至清末。¹²²《點石齋畫報》一幅題名為〈璇宮課織〉的報導(圖5)，盛讚慈禧此舉，因為：

蠶桑為中國自然之利，延之今日不免漸為外洋所奪，今者皇太后以親蠶為天下倡，特於禁御之中研究織纒之法，從此後宮嬪御、大內才人咸得以妙手靈心贊襄黼黻，村姬里婦遜聽風聲，其有不益勵蠶工，勤修女織也哉？¹²³

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工坊，或許可以解釋慈禧在大清國的雙重角色扮演。西苑豐澤園有皇帝行躬耕禮的耜田，亦有皇后行親蠶禮的先蠶壇。皇后親蠶禮從養蠶到織布的整套複雜儀式，皆在皇城西苑圍牆內發生。而躬耕禮的空間範疇擴及帝京，皇帝本人要先去紫禁城中和殿內檢視穀種與農具，然後到外城先農壇祭拜先農神並親耕，再回到皇城西苑豐澤園耜田演耕。¹²⁴事實上，慈禧因為不曾身為皇后，並未履行過皇后親祭先蠶大典，咸豐時期(1851-1861)的親蠶禮，皆由慈安皇后履行。¹²⁵不過，當慈禧同時扮演著皇太后與實際執政的一國之君角色，在考慮民生問題時，可能不只要「親蠶躬桑」，同時也要顧及「躬耕帝耜」，集推廣「耕」「織」任務於一身。

綜上所述，慈禧以一國之君的意志欲重建圓明園，並輾轉收藏百鳥堂萬國物種於內府，即使囿於現實無法執行圓明重建計畫，她仍試

122 「光緒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總管增祿口傳奉懿旨，著於集靈園內踏勘房間一所，安設機張名曰綺華館」，轉引自楊永占，〈清代皇后親蠶躬桑論述〉，頁 582。

123 盧群，〈晚清社會新聞圖錄——北京舊聞〉，頁 159。

124 劉毓興，〈清帝親耕先農壇〉，頁 50-51。

125 楊永占，〈清代皇后親蠶躬桑論述〉，頁 5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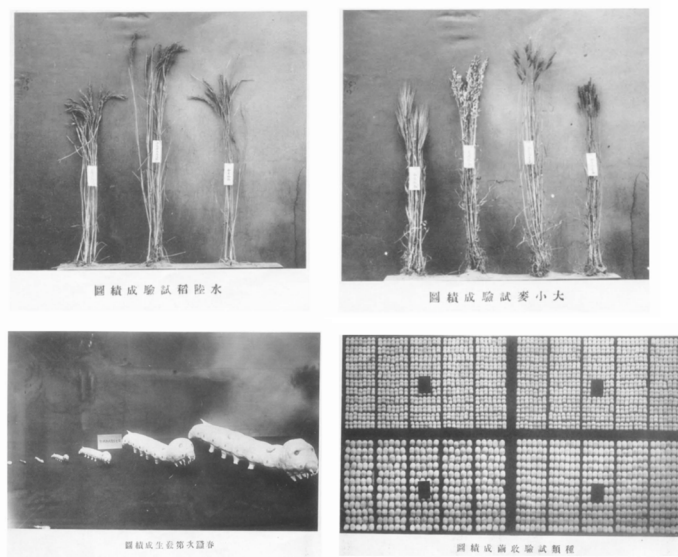
圖整修清漪園為頤和園，擴建三海以恢復帝京風華。雖然經歷庚子西狩出逃的慘劇，慈禧卻更確立自己身為大清國實際統治者的身份，扛起新政大纛主導變法，不再躲躲閃閃以垂簾聽政方式圈限於皇太后的西苑內，而是擴大「藉田」概念於禁囿之外，於北京城外的樂善園成立農事試驗場，園內多處景點皆慈禧親自命名，包括「暢觀樓」、「自在莊」、「翺風堂」等。¹²⁶而農事試驗場內亦有一座新設立的蠶桑館，包含「分蠶室、繅絲室、切桑室、器械標本陳列室」，¹²⁷可視為集靈囿「綺華館」的公開版本(見圖 6)。身為大清國女主，慈禧不僅主掌親蠶，同時透過農事試驗場推動名義上屬於皇帝職權的「藉田」，建置一座具現代性的勸農課桑儀式場域。宣統元年農事試驗場公布的第一期成果報告中，包含了 5 項農業科技實驗成果，分別是〈試驗地土性分析表〉、〈肥料分析表〉、〈本場五穀栽培法〉、〈本場五穀試驗成績表〉、〈本場育蠶試驗成績表〉。¹²⁸過往的皇家年度豐產儀式，轉化成現代實驗室內農業專家們的日常實驗操作與紀錄(見圖 7)，集結成一本本有實驗數據並影像的報告書，向大眾公開以推廣現代化農業科學知識。

126 西苑本有「翺風亭」，見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卷上，頁 7。

127 葉基禎，《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報告第一期》，〈奏章恭錄〉，頁 5。

128 葉基禎，《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報告第一期》，頁 27-78。

圖 7 農事試驗場實驗影像紀錄



資料來源：葉基禎，《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報告第一期》，頁 57(左上)、59(右上)、73(左下)、79(右下)。

農事試驗場的設置預算及相應的園區管理費用，在慈禧主政末期，的確是一大筆財政負擔。光緒三十四年四月(1908年5月)，監察御史秦望瀾(1870-1928)上奏直陳：「農工商部之萬生園陳列所均非當務之為急，不如停辦之為愈。」¹²⁹而至宣統二年五月(1910年6/7月)，農工商部是大清各部會中「經濟困難之冠」，已經發不出員工薪水，且「其萬生園每月進款不過四百餘千，不足以供虎豹之用因是虧累甚鉅」。¹³⁰然

129 〈秦御史奏陳修明內政〉，《申報》，1908年5月26日，第4版。

130 〈京師近事〉，《申報》，1910年6月21日，第5版。

而，對慈禧而言，萬生園是對帝國未來想像的重要媒介之一。根據《申報》記載，慈禧在光緒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間，至少3度在來回於頤和園、萬壽寺、西苑的路途中，順道參訪萬生園。

萬生園，如同頤和園一般，是晚年慈禧行使一國之尊權力並展現其意志的場域。光緒三十三年六月(1907年7/8月)萬壽節前，因革命黨人揚言暗殺慈禧，某軍機大臣為保護慈禧等人身安全，請求兩宮盡量停留在中南海，不要回頤和園。但是慈禧以「汝輩如此小心惜命，何能辦大事，似此愈中奸人之謀，我固無懼」的態度，刻意出巡由頤和園至萬壽寺捻香，然後到萬生園觀賞獅豹動物，並在倚虹堂用膳，完畢之後再回頤和園。¹³¹三十四年四月十三日(1908年5月12日)，慈禧與光緒乘四輪馬車至西直門倚虹堂，然後慈禧乘船光緒乘馬車遊萬生園，再至萬壽寺捻香，方返回頤和園。¹³²九月二十六日(10月20日)，距離光緒與慈禧相繼駕崩僅有一個月，兩宮在萬壽寺捻香完畢後，再度駕臨萬生園，這一次，身體狀況已經極差的慈禧，卻決定以「步行遊覽該園，植物科特備秋海棠六十餘種菊花二百餘種，慈聖頗悅逐一賞玩」，賞花完畢之後在園內用膳，並賜膳給萬生園總辦。¹³³這一次的參訪，極為正式隆重，是慈禧親自驗收農事試驗場籌建兩年的成果。農工商部各堂官員，並京師農務大學堂學生排成長列在農事試驗場外迎駕。¹³⁴雖然《申報》上的報導相當簡短，但我們或可想像，慈禧梭巡在自己授意下完成的最後一個園囿，也是皇室贊助下成立的第一個公開園囿，其象徵意義並不下於乾隆為收集寰宇而造的圓明園，或許稍微彌補了她在西狩之後政治生涯的低谷。換句話說，慈禧親自驗收農事

131 〈革命黨暗殺之影響〉，《申報》，1907年8月16日，第4版。

132 〈京師近信〉，《申報》，1908年5月17日，第4版。

133 〈京師近信〉，《申報》，1908年10月31日，第10版。

134 徐啟憲，〈西太后巡幸農事試驗場〉，頁4-5。

試驗場籌建兩年的成果，正如過去任何一位男性皇帝於南苑圍場完成春蒐大狩、八旗大閱等儀式；萬生園，無疑是慈禧的南苑圍場。

六、結論

慈禧放棄圓明園整修計畫之後，將皇室樂善園禁園公開化，成立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或稱「萬生園」，是大清國第一座由中央部會主導的、兼具農事試驗場、動物園、博物館、博覽園之複合式機構。萬生園成立之前，內務府負責的皇室春蒐秋獮儀式已於十九世紀中期完全廢止，皇室成員與動物不再同臺演出；南苑圍場官地已逐一放領給旗民作為耕地生產之用，京城內的皇室動物圈養機制已逐一廢止或即將走近尾聲。在預備立憲的政治語境下，萬生園之於女性領袖慈禧，或如南苑圍場之於帝國歷來的男性領袖。南苑圍場曾是京城附近清皇室管轄的最大野生動物園，很有潛力轉型成現代的公共動物園。但後來因為內務府管理策略改變，野生動物大量減少，最後全面放領開墾，成為農墾區，南苑就此消失。而此「動物園園農墾區」結合的概念，在慈禧太后主導晚清新政過程中，以樂善園場域進行全新嘗試，建構農事試驗場，成為「觀稼勸農」、「導民善法」的「萬生園」。¹³⁵

就性別政治而言，慈禧身為女性帝國領導人，並不允許如大清皇帝般，親自執行祭天祭地的豐產祭儀，但是她贊助並時常視察的萬生園，某種程度上，成為其專屬的政治舞臺：以馴養繁衍代替追蹤獵殺

¹³⁵ 商部於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呈的〈商部奏請撥官地興辦農事試驗場摺〉中提及：「臣等竊思近年南苑禁地均經奉旨陸續招墾，仰見朝廷敦崇穡事之至意。現樂善園地勢雖屬沿河，蹕路所經，而觀稼勸農聖朝所重，將來種植繁衍彌望青蔥，尤足以供宸賞。」見〈商部奏請撥官地興辦農事試驗場摺〉，頁 113。

祭祀並犧牲，以全民皆可購票入場的公共園囿代替皇室八旗與蒙古王公子弟的專屬獵場。如果，乾隆自認為文殊菩薩大威德金剛之化身，可降伏惡魔猛獸以護善眾生，那麼，自認是重入世間聞聲救苦自在如來觀音菩薩的慈禧，的確需要創造一套不同於盛清時期帝國動物、天朝藩屬之間的觀演場域，以脫離帶有擊殺降伏象徵意義的大狩儀式。¹³⁶如同當年藩屬國使臣朴趾源對帝都皇家百獸房百鳥房感受到的天朝氣象，萬生園在清末成為慈禧的形象傳播媒介，以動植物為演員，展演「生養萬物」並「滋養萬民」的古典政治修辭。因此，在天朝體制的強弩之末，外藩廓爾喀使者得以悠閒的參觀萬生園，而非如乾隆廓爾喀之役後迫使其貢馴象良駒，並留下詩畫以誌事。

就東亞現代性而言，這座萬生園，嫁接在大清既有的皇家儀式上，並將清皇城內外眾動物參與者，以現代性語境轉化串連之。西苑既有的耜田禮與親蠶禮儀式，轉化成企圖提高生產力的科學實驗；而原本散落在紫禁城周邊的百獸房、百鳥房、象房、虎城裡的各類動物成員，與集靈囿內的北堂動物標本，則組成了公共動物園與博物館。將農事試驗場設立的過程，放在十九世紀現代性對東亞政治影響的視角來檢視，可說是大清皇室「參贊天地之化育」的方式，在「儀式化自然」的基底上，逐步融入更多「現代化自然」之政治操作手段的歷程。

農事試驗場出現之前，皇室的責任就是透過年度祭天、祭地、春蒐、秋獮、耜田、親蠶等豐產儀典，展演不可侵犯的、具神聖超越性之「土地生命力」。¹³⁷這些豐產儀典的淵源甚至可遠溯至先秦時代，¹³⁸而大清

136 關於慈禧扮觀音像，見王正華，〈走向「公開化」——慈禧肖像的風格形式、政治運作與形象塑造〉，頁 251-256。

137 關於亞洲傳統自然道德觀中的神聖超越性，並以此超越性作為挽救當前全球生態危機的解方，見 Prasenjit Duara,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3-52.

138 林素娟，〈土地崇拜與豐產儀典的性質與演變——以先秦及禮書為論述核

天子在儒教倫理下透過親身執行儀典，以彰顯敬天法祖並先聖先賢之智慧。然而，農事試驗場出現之後，清皇室「參贊天地之化育」的方式，轉而強調以蒐集、調查、設計實驗流程、詳細記錄結果以作為分析依據等科學手段，提升「土地生產力」。過去南苑的春蒐秋獮儀式，動物是因「為生而殺」，天子祈求天賜與「土地生命力」以養萬民而殺之；而當前萬生園的動物展示，動物則是「為殺而生」，人為尋求土地生產力之科學實驗而圈養觀察之。弔詭的是，在此轉變過程中，原本於豐產儀典前臺正式演出的「人透過武力擊殺動物以使之降伏」的橋段，隱匿在萬生園後臺科學實驗的日常裡；而原本隱沒在豐產儀典後臺的日常圈養與娛樂，反而浮上檯面成了萬生園動物展示的前臺。也就是說，「為生而殺」與「為殺而生」早已共存於皇家園囿的動物展演機制裡，只是前臺後臺異地而處，繼續共融於萬生園中。

事實上，「現代化自然」以提升「土地生產力」，與「儀式化自然」以展演「土地生命力」，在清帝國的農業政策裡並行不悖。最著名的例證便是康熙皇帝親身參與御稻米的選種培育歷程，將南方帶回的穀種藉田於皇家豐澤園中，康熙再從這些秧苗中特選出早熟變異單株，育成適合北方風土環境的水稻新品種，最終得以在長城地帶北方氣候中推動一年兩穫的稻米收成。¹³⁹因此，慈禧設立的農事試驗場，一部分可說是循著祖宗家法，同時引入歐美日本當時先進的農業科學實驗概念，混融而成，以解決當時帝國境內農業產量不足的經濟壓力。套用拉圖(Bruno Latour)在〈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一文中的概念，慈禧新政以農事試驗場為科學實驗室，「轉譯」清皇室過去「參贊天地之化育」的既有豐產儀典語彙，成為現代農業技術的專有

心〉，頁 615-651。

139 李朝盈、李增高，〈康熙與水稻〉，頁 125-128。

名詞；透過一次次小型實驗試誤過程，以便未來有效率的推動大規模技術轉移(至農民)；並以動物園、博物館、博覽園、實驗報告書等公開媒介，有系統的展示「豐產」實驗過程，博取大眾信任，尋求利益團體(如地方政府或實業家)的共同支持。¹⁴⁰

「儀式化自然」並未因萬生園出現而消失，「現代化自然」也並非專為設立萬生園而突然自西方引進。但是，對清國執政者而言，農業科學實驗室的確是外來機制，此機制使得綿延超過兩世紀之久的大清皇家園囿動物展演，逐漸自豐產儀典「去脈絡化」，並「再脈絡化」進農事試驗場的豐產實驗與展示機制中，也為慈禧締造了一個重要的觀看媒介，向大眾呈現其主導的清末預備立憲改革，以重新確認愛新覺羅皇室繼續統治中華帝國的權力。

(本文於 2017 年 8 月 23 日收稿，2018 年 6 月 7 日通過刊登。

本期原訂 2018 年 3 月出刊，因故延至 2018 年 7 月出刊。)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德國柏林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舉辦的「Making the Qing Palace Machine Work」學術工作坊(2015 年 5 月 28-29 日)，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 年 4 月 29 日)。感謝 Martina Siebert、Chen Kaijun、高彥頤(Dorothy Ko)、賴惠敏、賴毓芝、鄭麗榕等學者提供寶貴意見，以及本刊匿名審查教授與編輯委員會一路細心指正。其中若有任何錯誤，本人當自負文責。

140 拉圖(Bruno Latour)，林宗德譯，〈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頁 220-263。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一)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館藏號 01-12-024-03-017、01-12-024-03-024。

〈乾隆二十五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 25 冊，皮裁作，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十八日，頁 329。

〈乾隆四十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 38 冊，如意館，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八日，頁 6。

(二)報紙

《大公報》(天津)。

《申報》(上海)。

《順天時報》(北京)。

(三)書籍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允禔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清聖祖，《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清高宗，《御製詩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清高宗，《樂善堂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據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朴趾源，《熱河日記》，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2。
- 吳長元，《宸垣識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據北京出版社1964年本重新排印。
- 吳振棫，鮑正鵠點校，《養吉齋叢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1983。
- 汪啟淑，楊輝君點校，《水曹清暇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
- 昭槿，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 祝德麟，《悅親樓詩集》，清嘉慶二年姑蘇刻本，1797，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 祝慶祺，《刑案匯覽》，清道光棠樾慎思堂刻本，1834。
-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奕賡，《括談》，民國二十四年鉛印佳夢軒叢著本，1935。
- 徐兆璋，《徐兆璋日記》，合肥：黃山書社，2014。
- 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龍威秘書本排印。
- 楊小燕，《北京動物園志》，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2。
- 張際亮，〈虎園行〉，收入徐世昌輯，《晚晴移詩匯》，卷138，頁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愛新覺羅·永瑒，〈二月四日駕幸涼鷹臺觀虎槍營人殺熊一豹一虎三因賦長歌紀事〉，收入董誥等編，《皇清文穎續編》，卷69，頁212，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據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葉基禎，《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報告第一期》，北京：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1909。
- 載灃，《醇親王使德日記》，收入莊建平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3冊，頁358-382，上海：上海書店，2009。
- 農事試驗場，《農商部農事試驗場成績報告》，北京：農事試驗場，1914。
- 農商部中央農事試驗場，《農商部中央農事試驗場第三期報告》，北京：農商部中央農事試驗場，1916。
- 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 樊國樑，《燕京開教略》，北京：救世堂，1905。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滄州：勝世堂，1923。

錢泳，張偉點校，《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

David, Armand. *Natural History of North China, with Notices of That of the South, West, and North-East, and of Mongolia & Thibet*. Shanghai: Da Costa & Co., 1873.

Peel, Charles Victor Alexander. *The Zoological Gardens of Europe: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Features*. London: F.E. Robinson & Co., 1903.

(四)報刊文章

〈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戴端會奏各國導民善法請次第舉辦摺〉，《直隸教育雜誌》，19(天津，1906)，頁 1-2。

〈本部奏農事試驗場歷辦農林事宜暨各項工程大概情形摺〉，《商務官報》，10(北京，1908)，頁 4-5。

〈商部奏請撥官地興辦農事試驗場摺〉，《東方雜誌》，3：6(上海，1906)，頁 112-113。

〈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參觀萬生園報告書〉，《東方雜誌》，9：7(上海，1906)，頁 24-39。

Styan, F.W. "Curator's Report."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 (January 1883): viii-x.

二、近人論著

丁進軍，〈清末商務史料(下)〉，《歷史檔案》，1992：1(北京，1992)，頁 48-57。

毛憲民，〈清代鑾儀衛馴象所養象〉，《紫禁城》，1991：3(北京，1991)，頁 16-21。

王正華，〈走向「公開化」——慈禧肖像的風格形式、政治運作與形象塑造〉，《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2(臺北，2012)，頁 239-316。

王奎，〈商部(農工商部)與清末農業改良〉，《中國農史》，2006：3(南京，2006)，頁 3-12。

王家鵬，〈清代皇家雅曼達噶神壇叢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4(北京，2006)，頁 98-121。

王笛，〈清末民初我國農業教育的興起和發展〉，《中國農史》，1987：1(南京，1987)，頁 65-81。

- 左圖、王蔚，〈海晏堂四題〉，收入張復合編，《中國近代建築研究與保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頁 307-320。
- 朱光華，〈清代動物園〉，《紫禁城》，1984：1(北京，1984)，頁 34-35。
- 何蓓潔，〈清代建築樣式雷世家〉，收入張懷安編，《大戶人家·建築家卷》，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 3-62。
- 吳空，〈從天主堂到監國攝政王府〉，收入中央文史研究館編，《崇文集二編——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673-683。
- 吳青樺，〈清朝隨園官馬之研究〉，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4。
- 吳崢嶸，〈標本名家劉樹芳及傳人〉，《世紀》，2009：2(上海，2009)，頁 48-52。
- 呂鍾寬，〈斬命魔與東海黃公——道教儀式中的戲劇化法事與小戲源流關係試探〉，收入曾永義等編，《兩岸小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2001，頁 136-159。
- 李朝盈、李增高，〈康熙與水稻〉，《北京農學院學報》，1990：1(北京，1990)，頁 125-128。
- 東京大学総合研究資料館特別展示実行委員会編，《乾板に刻まれた世界——鳥居龍藏の見た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総合研究資料館，1991。
- 拉圖(Bruno Latour)，林宗德譯，〈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收入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編，《科技渴望社會》，臺北：群學，2004，頁 220-263。
- 林素娟，〈土地崇拜與豐產儀典的性質與演變——以先秦及禮書為論述核心〉，《清華學報》，39：4(新竹，2009)，頁 615-651。
- 侯江、李慶奎，〈近代中國生物標本製作掠影〉，《博物館研究》，115(長春，2011)，頁 55-64。
- 侯皓之，〈行獵詰戒——康、乾二帝圍獵殪虎的意義與虎槍營的演變〉，《漢學研究》，34：2(臺北，2016)，頁 141-174。
- 侯皓之，〈見盛觀衰——盛清諸帝飼犬活動的演變與意義〉，《漢學研究》，31：3(臺北，2013)，頁 137-168。
- 范燕秋，〈日治初期的臺灣博物學會——日本博物學家與臺灣自然史的建構〉，《師大臺灣史學報》，5(臺北，2012)，頁 3-39。
- 徐啟憲，〈西太后巡幸農事試驗場〉，《紫禁城》，1993：1(北京，1993)，頁 3-5。
- 高島春雄，〈四不像盛衰史〉，《山階鳥類研究所研究報告》，1：1(東京，1952)，頁 5-14。
- 黃小茹，〈清末農事活動的行政支撐和社會參與——以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的匯集活動為

- 例》，《山西大學學報》，2008：1(太原，2008)，頁 11-17。
- 翁飛，〈李鴻章與蠶池口教堂遷移案〉，《學術界》1994：1(合肥，1994)，頁 39-46。
- 張舒影，〈物象認知與天學弘義——百鳥堂考〉，收入趙建敏編，《天主教研究論輯》，第 10 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頁 196-213。
- 張瓊，〈清代皇帝大閱與大閱甲冑規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6(北京，2010)，頁 89-103。
- 畢梅雪、侯錦郎，《木蘭圖——與乾隆秋季大獵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 陳政國，《清代馬政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6。
- 陳瑋芬，〈日本「自然」概念考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6(臺北，2010)，頁 103-135。
- 楊小燕，〈民國時期北京的兩個農事試驗場〉，收入劉秀晨編，《京華園林叢考》，北京：北京市園林局，1996，頁 265-266。
- 楊永占，〈清代皇后親蠶躬桑論述〉，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論文集》，上冊，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頁 571-583。
- 劉仲華，〈「足民食」與「祖宗之制」的抉擇——嘉道以後南苑私墾查禁與招佃墾種之議〉，《清史研究》，2015：3(北京，2015)，頁 86-95。
- 劉毓興，〈清帝親耕先農壇〉，《北京檔案》，2003：6(北京，2003)，頁 50-51。
- 盧群，《晚清社會新聞圖錄——北京舊聞》，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3。
- 穆祥桐，〈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中國科技史料》，1987：4(北京，1987)，頁 22-27。
- 賴毓芝，〈從印尼到歐洲與清宮——談院藏楊大章額摩鳥圖〉，《故宮文物月刊》，297(臺北，2007)，頁 24-37。
- 賴毓芝，〈清宮對歐洲自然史圖像的再製——以乾隆朝《獸譜》為例〉，《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0(臺北，2013)，頁 1-75。
- 賴毓芝，〈圖像、知識與帝國——清宮的食火雞圖繪〉，《故宮學術季刊》，29：2(臺北，2011)，頁 1-77。
- 鮑麗達，〈清代南苑土地的開發與利用略述〉，《農業考古》，2016：3(南昌，2016)，頁 130-137。
- Ames, Eric. *Carl Hagenbeck's Empire of Entertain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 Baratay, Eric, and Elisabeth Hardouin-Fugier. *Zoo: A History of Zoological Gardens in the West*.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4.

- Duara, Prasenjit.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Eisenstadt, Shmuel N.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129, no. 1 (2000): 1-29.
- Eisenstadt, Shmuel N. *Japanese Civilization: A Comparative Vie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 Hoage, Robert J., and William A. Deiss, eds. *New Worlds, New Animals: From Menagerie to Zoological Park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Kisling, Vernon N., ed. *Zoo and Aquarium History: Ancient Animal Collections to Zoological Gardens*. Boca Raton: CRC press, 2000.
- Marcon, Federico. *The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Jap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 Miller, Ian J. *The Nature of the Beasts: Empire and Exhibition at the Tokyo Imperial Zoo*.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 Miller, Ian J., Julia A. Thomas, and Brett L. Walker, eds. *Japan at Nature's Edge: The Environmental Context of a Global Powe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 Péquignot, A. "The Rhinoceros (fl. 1770-1793) of King Louis XV and Its Horns." *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40, no. 2 (October 2013): 213-227.
- Poliquin, Rachel. *The Breathless Zoo: Taxidermy and the Cultures of Longing*.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Ritvo, H. *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Rothfels, Nigel. *Savages and Beasts: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Zoo*.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 Scott, John.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t Paris, Commonly Called the Jardin des Plantes." *The London magazine* 6, no. 23 (November 1826): 401-419.
- Skabelund, Aaron. "Animals and Imperialism: Recent Historiographical Trends." *History Compass* 11, no. 10 (October 2013): 801-807.
- Thomas, Julia A. *Reconfiguring Modernity: Concepts of Nature in Japanese Politic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Walker, Brett L. *The Lost Wolves of Japa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 Walker, Brett L. "Animals and the Intimacy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52 no. 4 (2013): 45-67.

三、網路資源

-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Le rhinocéros de Louis XV." <http://www.mnhn.fr/fr/collections/ensembles-collections/vertébres/mammifères/rhinoceros-louis-xv>. Accessed June 6, 2018.
-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楊玉君教授演講「俄羅斯館藏中的晚清圖象」紀要〉，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498，擷取日期：2018年6月18日。

From Imperial Menageries to Public Zoological Garden: Captive Wild Animals at the Qing Court

Hui-chun Yu

Department of Art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In 1908,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Empress Dowager Cixi, the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 or the “Wanshengyuan” (萬生園, Garden of Ten-thousand Lives), was officially opened to the public. As the first central-level experimental station, besides agricultural fields, the entire complex also included laboratories, botanical gardens, a natural history museum, and a zoological garden. All were the first such cultural facilities in the empi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the captive wild animals in imperial menageries that Qing sovereigns had maintained for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were gradually de-contextualized from imperial ceremonies and then re-contextualized into the new agricultural experimentation station.

Since the early Qing,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內務府) managed menageries around the Forbidden City, including the Imperial Bestiary (baishofang 百獸房), the Imperial Aviary (bainiaofang 百鳥房), elephant stables, tiger rings, and so forth. Many of beasts performed important ceremonial roles in imperial rituals related to hunting, killing, and exhibiting furs. However, after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 number of animals kept in imperial menageries rapidly declined. At the same time, the ceremonies of hunting and killing were no longer conducted in the Nanyuan (南苑) or Royal Southern Hunting Park in Beijing, and the Qing empire stepped into the age of the zoological garden with the help of the global trade in animals and the demands of modern urban public space. Imperial animals and their mounts became collections of the zoo and

museum. The imperial stages that had provided animals with the roles of power, control, dominance, and domestication were gradually turned into scenes of daily entertainment and recreation. The Garden of Ten-thousand Lives became one of several key media to visualize Cixi's preparatory movement for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Grafted onto Qing imperial harvest ritual ceremonies, the Garden of Ten-thousand Lives modernized the classical political rhetoric of "raising all things and nourishing all the people" into the context of zoo and museum by transforming and reconnecting animal participants. The royal ploughing ceremony and silkworm-feeding ceremony were converted into scientific experiments for improv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No longer being sacrificed, those beasts in spring and autumn royal hunting ceremonies, together with other species, become domesticated zoo animals under the public gaze. By gradually integrating "ritualized nature" with more "modernized nature," the birth of the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reflected the political change of the Qing imperial way to cooperate with nature

Keywords: Wanshengyuan,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zoological garden, museum, Empress Dowager Cixi